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10期

【特稿】

一九七九：红军师洗劫越南城/刘家驹

一九九八：访朝纪实/千 树

【百年中国】

“4.8 民族宫事件”的蝴蝶效应/胡宗式

画说我的一生/ 刘海鸥

16. 上战场，枪一响……（中）（1967年8月-10月）

【书讯】

内蒙兵团 ▪ 知青生活 ▪ 长篇小说

沈言真著《青春无歌》在美出版

附：内容简介/作者自白/战友评论

【序跋】

隐秘之恋：“无歌”时期的爱情

——《青春无歌》序言/雷 霆

从“无歌”到禁声——《青春无歌》后记/沈言真

实录与诤言——《一路走来》序言/张宝林

【述往】

清华文革记忆/老 唐

1973-1977：我的“二外”记忆（13）

——“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李红云

【读者来信】

1. 何蜀称赞海鸥《画说我的一生》，并纠错

2. 塔拉评言真《写给明天的纪念》

【资料】

重庆“八一五”战歌：《“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词曲

一封充满革命感情的信（作者宋心鲁）

【特稿】

一九七九：红军师洗劫越南城

刘家驹

127师属武汉军区，是一支有红军老底的部队。它的381团2连，早在1928年朱德在赣南起义时，林彪就是第一任连长。自林彪主持军委，2连的晚点名，第一个要呼叫林彪的名字。军区把127师树立为政治标杆，全区军政训练的先进经验，都要从这里出炉；全区的军政干部，大都要从这个师培育。1965年，林彪秘书关光烈出任该师的政治委员，更是向全军彰显了林副统帅对这支部队的亲切关怀，127师的人以此自豪了好些年。

哪知祸起萧墙，1971年9月，林彪儿子林立果誓死要推翻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把关光烈召到北京密商（此时的关光烈刚升任43军政治部主任），要他从127师派出一个火箭筒班，到沪宁线上的硕放桥狙击毛泽东南巡后返京的专列。尽管是纸上谈兵，“913”事败，127师被中央专案组列为参与政变的武装力量，师团干部给整的个个灰头土脸。1979年，中央军委组织对越南“自卫还击”作战，总指挥邓小平点名要127师参战，时任师长的张万年看到祥光降临，号召麾下打好翻身战，并向中央军委表态，要在战场上用鲜血冲洗昨天的污染。

127师按中央军委的指令，在越南打了17天就班师回到河南新安驻地。《解放军文艺》社领导从报刊上看到了他们“辉煌”的战绩，认定这个师仍然是坚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拳头部队，有宣传的典型意义，当即指派我率10名军内作家前往采写他们的英模事迹。

一、小纠纷引出大故事

我们一行被安置在师招待所，对我的礼遇从优，住进半山腰的一幢小别墅，这里是关光烈任政委时住过的（“913”事件后，他被关押5年，脱下军装，发配到洛阳啤酒厂当车间工人）。虽是几间小平房，环境却幽静，又有服务员照应。让我惊异的是套间的床、桌、椅都古香古色，豪华富丽。我住过不少高级招待所，参观过毛泽东在南京中山陵和西湖边刘庄的驻跸，那里的家具也没有这般炫目。

负责接待我们的师宣传科副科长告诉我，这都是从越南搞回来的战利品。橱柜上镌刻的花鸟人物生动，四角还包了银饰，很像我国岭南一带富裕人家的风情。立柜衣橱是黄梨木的，还散发出清新的木质香味。品位之高，堪与明清家具媲美。更难得的是，每件木质家具的穿、斗、卯、榫丝丝入扣，几乎看不到接缝。

靠墙的一排沙发是竹编的，龙飞凤舞的编织工艺仿佛是绘画，让人耳目一新，在国内是罕见的。我最欣赏的是桌前一把宽大的藤椅，它是由四根巨藤编成，四条腿有杯口般粗，用对称的支藤编织成了座位、扶手，靠背很像凤尾，其工艺之精巧，胜似天工。副科长还介绍说，这种藤子在越南不稀罕，但是要从千百条藤中挑选出一般粗细、支藤对称又均匀的，要花费很心血。副科长带着骄人的口吻说，你是来我们这里享受越南家居文化的第一人。

最初，我只是认为，这是他们在战场上顺手牵羊发的小财，直到我们住下的第三天，因为伙食问题，和招待所发生了一场纠纷，我这才意识到，这个师有一个阿里巴巴出入的山洞。

我们的一日三餐，是按师的接待上宾规格操办的，中餐是六菜一汤，三荤三素。开始还过得去，三天后，菜量大减，大家刚吃完一碗饭，盘子里的菜已告罄，负责我们生活起居的是武汉军区派来的高干事，他愤然找来管理科长问责，批评他给军区丢人现眼，刮油水不看对象，克扣的都是为他们上天言好事的“灶王爷”。

科长不买账，说目前是菜蔬上市的淡季，采购难。第二天饭菜依然如故。作家们吃不饱，到小卖部买饼干啃，高干事脸上挂不住了。一天中午，服务员刚把饭菜端来，满脸怒气的高干事不由分说，把一桌饭菜掀了个四脚朝天，碎盘汤菜狼藉一地，当即惊动了师的首长，政治部主任来了，参谋长来了。高干事放声骂开了：你们领导都看看，他们是来自全军的作家，是军区的客人，你们给人家吃什么？猫食！为什么不把你们从越南搞回来的东西拿出来待客……

主任、参谋长连连拱手，向我们赔不是。半小时后，重新端来一桌丰盛的菜肴，还上了杜康酒，两位领导向作家们一一举杯致歉。从此，我们的生活大为改善，隔三岔五地还能吃上鸡、鸭、鱼。

二、仕途经济与军长的家私

作家们常年在部队流转，和各级招待所打交道不断，深知招待所接待经费有

限，生活管理人员多年来已形成边“捞”边“补”的潜规则，作家们喻为“仕途经济”。比如，接待上级机关和首长，就不惜老本往里填。住套间，有专职服务员；吃“霸王别姬”（王八炖仔鸡），瑶池（清蒸）鳊鱼或香妃（酥）板鸭之类的佳肴。要是来自下属营连干部或来办事的友邻过客，对不起，就只能是“剩水残山无态度”了。

走笔至此，我要提到43军军长孔宪礼。43军是127师的上级，孔宪礼还是《解放军文艺》一位值得尊敬的作者。军长写小说，是我军文化素质升华的表现，尽管是业余的，武汉军区的领导，还是要批他不务正业。他每次来北京，都要到编辑部来探望。高干事掀翻饭桌的事他知道了，在电话里向我深表歉意，还发出真诚的邀请，等作家们写作结束，他将在洛阳军部驻地好好款待我们。他没有食言，后来我们到了洛阳住了三天，天天游览宴请。越南战争他没有参与——他反感这场战争。

师长张万年一下战场就提升为43军副军长。此时他正搬家去洛阳履新，他的住地和我近邻，我看到古典家具和奇花异草装了满满六卡车，一股类比之情油然而生：战争年代我军一个旅长的家当，只有一驮子（团长仅是一马褡子）。前几年，我到过几位大军区首长家，都没见过有张师长如此丰厚的家私。我想起高干事说“把从越南搞回来的东西拿出来。”他们究竟“搞”了些什么东西？

43军军长孔宪礼，当年战场上为他拉回了一套高质量家具，他拒绝了。20年后，他到济南上任时，全部家当只有两车传统的床椅箱柜。

20世纪90年代末，孔宪礼来京看望我，那时43军的建制已撤销（全军裁编为24个集团军），这位尊敬的儒将降了一级，被安排到济南军区步校当校长（因步校是副军级单位）。而此时的张万年在江泽民的提携下已是军委副主席。我为孔军长的降尊屈就愤愤不平，他却坦荡地说，我能搞军事教育算是幸事，可以经常给学员灌输些智仁勇嘛。此言引起我心底的震动，我们几十年念念不忘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我军这位高级指挥员的心目中已经褪色。

三、张万年师长拍板洗城

作家们全身心投入采访，我却把“搞越南的东西”惦记于心，每到各团转悠时，一边关注作家的采访进度，一边问起如何获取战利品的事。干部们虽意识到

不光彩，只要我提起，都能告诉些片段的故事，我就点点滴滴的积存于心，多年后翻出来重新组合，细节可能有出入，但基本情况是真实可信的。

对越的“自卫反击”，由广州、昆明、成都、武汉四个军区组成五个集团军10万人的作战部队。127师进入作战地位时，序列编在东线集团，战略目标是占领同禄县城，造成威胁越南重镇海防的态势。

1979年2月17日凌晨，经强大炮群的炮火准备，127师从我国的边境小镇爱店进入越南，先头翻山越岭突入，后续是坦克携带步兵沿公母山之间的夹沟跟进。越方没有出动任何正规军进行抵抗，只是在公路两侧的山地部署三五成群的民兵，依靠喀斯特山的嶙石和树丛用冷枪冷炮狙击。攀扶在坦克上的我军士兵，成了他们的活动靶子。有战场经历的张万年懂得，如向两翼展开战斗队形反击，越南人居高临下，我军必然会遭到更大的伤亡，他决定照直前进，尽管在公路上行军被动挨打，但是师的战略实施不会迟滞。

19日到达同禄时，127师伤亡600余人，对一个齐装满员已逾万人的北方甲种师来说，伤亡属轻度的。值得庆幸的是，按中央命令准时占领了目的地，这就是了不起的胜利，几乎所有的新闻单位都进行了高调的报道，说张师长率红军师势如破竹攻占了同禄城。

其实同禄已是一座空城，早在半月前，越方已进行了有组织的疏散撤离。张万年率他的指挥所入城时，街道上我军已是岗哨林立，家家闭户，房门上贴有师宣传科印制的“民宅，不得入内”的禁令。张万年转了几条街，见不到战争创伤的痕迹，他满意地对身边的作战科长说，我们教训了越南，对得起越南人民。

师长话音落下不到半个时辰，一辆辆军用卡车从他身边飞驰而过，车牌号显示，是43军后勤部的支援车队，他们的任务是配属127师担负人员、弹药输送的。为什么把空车开进城？他拦住一辆询问，驾驶室里一位干部告诉他，说是副军长的指示，要他们进城搞战利品。

张万年不相信，因战前曾有过决定，只收缴越军的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对民间任何物品一律不得动用或带回国内。这是战场纪律。他让作战科长找来军需处长问个究竟，确认是副军长的指令时，他无可奈何地骂了一句：闹了半天，我们是猫打翻了饭钵子，给狗帮了忙。作战科长插话，上头都能搞，我们为什么要犯傻？张万年心动了，让各团领导马上来见他。

团长政委们都来了，张万年先说了军后勤搞战利品的事，然后问大家，我们怎么办？团长们没有不愿意趁火打劫搞点物资的，理由充足：其一，我们过去无偿的援越抗美，他们忘恩负义，现在搞东西是回收礼品。其二，这是一场教训越南的战争，既不要他们投降，又不让他赔款割地，搞些战利品当成果，最能体现我们教训越南的意义。其三，越军一直和我们脱离接触，无仗可打，倒不如进城打一场无本万利的战争，还可以提高士气。政委们没有表态，他们是党的政策代表。战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从他们嘴里说出去的，如今要他们出尔反尔，将有失政工干部的大信，更怕秋后算账，要他们承担一把手的政治责任。

张万年是军事干部，我军的纪律条例对他来说，平时有约束力，这时候就不同了——“枪声一响、黄金万两”是古往今来所有军队的定律，何况眼下有上行可效，又有团长们的全力支持，法难责众，不拿白不拿。他拍板，干！命令全师集中可动用的400台车，从一线作战部队和警戒部队中抽调出6000人进城，让作战科长以团为单位划片洗城。

无需作深入的动员，张师长的决心就能唤起部队的巨大热情。入越前，政工干部们对干部战士面对生与死，足足做了两个月的思想政治工作，现在战争的恐惧已消失，为利益而争，人人奋勇向前。一时间，参与动手的部队，在干部的带领下蜂拥入城，径直奔向县政府机关大院，市政的楼堂馆所和事业单位的银行、仓库、粮站、商店、百货公司，放手扫荡。凡粮食、布匹、衣服、医药或日用百货和箱笼厨柜等，只要能搬动的，小件装箱或捆包，大件由几个人抬，集中到街边装车。那些天，街道上堆满货物，车辆不停地穿行，士兵们穿堂入室，来了个捞财越货大比拼。

二连一个战士告诉我，他的连队在同禄城郊担任警戒，一个排看守一个村子，连长要他们在村子里也弄些战利品。别看越南地处亚热带，有山有水有林，一年种四季稻谷，可农村比中国的还穷。根本原因是越南党的社会主义农村政策处处“学习”老大哥中国，把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割的连毛都不剩。我向排长建议，只在几个村干部家中下手。

我家在河南农村，村子穷不思变，因为村干部吃喝把酒杯都捏扁了。到夏收、秋收农民交不齐税，村干部就上门牵羊宰猪，连烧饭的锅也给端走。眼下要收拾几个越南的村干部，全排都同仇敌忾，争先恐后。我们分头到三户村干部家，宰

了一头牛，抱回几只鸡。这个村实在太穷了，我从村干部家翻箱倒柜一阵，才挑选了几件旧衣服，带回国内就打包裹寄回家了。二班一个战士搞了一架缝纫机，指导员说太笨，不让他带回国，他就卸下机头挂在树枝上当靶子，每天朝它放几枪。还有一个战士什么也没弄到手，也许出于对村干部的报复心理，他趴在人家灶台上给大锅里拉了一泡尿。

在洗劫全城的过程中，382团政治处主任告诉我一个新现象。他说，经过文革的洗礼，我们连队的干部战士大都由红卫兵替代了工农出身的。他们到了越南，抄家的本领又一次得到释放，价值判断比我们精明，入户拿什么，不拿什么，值钱的会藏在哪儿？他们都有一副火眼金睛，对所获得的物品，大件上交，小件归己，说是留给自己的战争纪念品。

我们这支自诩为人民的军队，小生产者的先天习性无处不在，这次掳掠物资，有的营连干部为了多捞多得，就指挥自己的分队“越境”打劫。只要是商店、仓库，不管分配给“张献忠”或是“李自成”的，谁都可以下手。只见大街小巷人如蚁动，络绎不绝，往往为一件贵重的物件相扯相夺，差不多每天都要发生几十起对骂，甚至动开了拳脚，如打得不可开交，政工干部就上去劝导拦阻，卫生人员也赶来为受伤者包扎伤口，幸好还没有达到动枪动炮的程度。

君不见，当年红军长征时一军团一师的2团、4团在云南为抢劫宣威火腿厂，打得几十人头破血流。1948年，刘邓大军攻下襄阳，为争夺缴获的化学炮和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18旅和28旅展开了一场枪战，死伤15人，让邓小平骂了七天的娘。

其实这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在我军的“光荣”传统之中，就有打家劫舍一项。比如红军初创时，就是一支流寇，军饷军粮就靠劫大户的金银财宝和粮食来支持，长征一路就靠打砸抢。到了陕北，地僻民穷，一边打土围子，一边种鸦片，我军才得以生存。解放战争，刘邓大军到大别山翻地三尺，烧杀掠夺，对贫下中农也不高抬贵手。我军的大善大恶，历来取决于政治需求。平时，官兵救火、救水、救人，也是实情，对此，媒体大写“人民军队爱人民”。

四、组织分赃

张万年有先见之明，深知抢来的越货分配不均会招来各级干部说三道四。他

事先把师团后勤部和所属分队集中组成接收站，让后勤部长在爱店选了镇郊一块空旷的场地，各自立起牌子定点做接收货物的堆集位置。当一辆辆车到达进场的入口处，后勤干部首先要点看车上的物品种类，然后告之驾驶员开到×团的点上卸货。虽说这种简单的分配达不到绝对平均，在战时能做到这样的大体公正，各单位也无话可说，张师长不但功德圆满，还得到好评。如配属 127 师作战的高炮团、坦克团、炮兵团也一视同仁，分到了等同的份额。

战利品到了团，由团的后勤处长再行分配给团机关直属分队和各营、连。连队主要分得粮食、食油、副食品和牙膏、牙刷、汗衫、剪甲刀、笔和小本之类不影响军容和内务的日用品，机关所分的就贵重些，机关越高所得就越高级，如自行车、摩托、家具或高档的日用品等，如是金银首饰或越币（盾）之类一律上交到军里。

我询问过师后勤的干部，他们所得各种货物从未有过登记，谁也说不清品种或吨位，在现场分摊之后就各自装上火车，他们只记得整整装了能挂 40 个车皮的五列。拉不了的，就做人情送给了爱店公社。

我走访 381 团时，看到所有连队把搞回来的粮食和副食，都按团统一规定堆积在室外，搭上苫布，其体积大约长 10 米，宽 5 米，高 3 米，形似一间工作房，和营房一起齐整整地排列，干部们指着如小山般的战利品自豪地说，粮食吃半年没问题，各种百货小件都分给了大家，人人有份。

团政委谈起搞战利品无顾无忌。他说，当部队进城甩开膀子大干之时，最初确实是抄的同禄县政府公家东西。我给部队还作出过严格的规定，不得进入普通人家。仅几天工夫，禁令止不住了，兴头一来哪分公家和私家，几乎家家都破门，人家早把自己细软金银带走了，可我们手不软，能拿的能搬的都不会手下留情。越南穷，城市贫困户多，他们把自己多年添置的家产哪怕是坛坛罐罐都看得很金贵。那些天，留守看家的越南老人、妇女，不少人紧追在战士的身后，哭着、叫着、拽着和战士争夺，有的战士脱不了身，就用枪托击打，或踢人家几脚，这岂不和当年鬼子进中国一个样子？师政委更是焦虑，把政工干部召到爱店开会，讨论如何面对这场洗城后果？会开了三天，谁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正巧，友邻传来信息，中线作战部队，夷平了有 20 万人口的谅山城；西线炸路毁桥，破坏通讯，掀翻了通向河内的铁路；我军所到之处洗光了商店、仓库，还大肆砍伐红

木等名贵木材，甚至把工厂矿山成套的重型机械设备完整地搬运回国。这些消息让政工干部们兴奋不已，就像吃了定心丸，大家商定，告诉部队，越南人反华，驱赶 20 万华人回国，又侵占了他们的家园，我们是以牙还牙，搞点物资理所应当。政工干部再也不害怕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张万年师长顶着。

我们一直干到中央军委撤退命令下达。在同禄洗城十来天，虽说大街上被抛弃的衣物柜橱等家什用具一片狼藉，但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房没烧一间，人没杀一个，街道上的树木没毁一棵，所拿走的东西，应视为物归原主。

政委所言人没杀一个，我相信，他仅是指的同禄城里。在城外的零星战斗中，他们把俘虏的百余名男女民兵，一律就地处决。

我们之所以出兵越南，更重要的原因是拯救“红色高棉”于危亡之中。就在我军进入越南作战之前的一月，他们已出兵占领了柬埔寨，洗劫了包括金边在内的 18 座城市。越南和他们原本也是“同志加兄弟”，涤荡式的洗劫财物比起我们是毫不逊色。处处追随中国的“红色高棉”，靠屠杀立威，国民经济搞的一贫如洗，已无法承受巨大的双重损失，提供救助的当然还是中国。❷

【特稿】

一九九八：访朝纪实

千 树

1998 年 8 月下旬，我随中国青少年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与我国山水相连的朝鲜。这次出访，恰逢朝鲜建国 50 周年庆典前夕，我团的任务除了“加强两国间的了解、合作以外，最主要的任务是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朝八日，我们团 14 人圆满完成了友好使命，与所有接触过的朝鲜人相处融洽。当我们在平壤机场与陪同的朝鲜朋友们挥别之际，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洒下依依惜别的泪水。

朝方首席翻译、平壤国际关系大学讲师徐光浩说：“与你们相处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负有特殊监督任务的黄元骏，在起初几天里始终面色阴沉，极其留心地观察着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但在彼此间老朋友般真诚坦率的感召下，他一点点放松了警惕，逐渐露出了笑容，分别在即，他握住我方团长的手，动情地说：“下次再来，我一定好好对待你们！”

访朝期间，我们先后参观了朝鲜官方视为圣地的万景台故居（金日成的出生地）、锦绣山纪念馆（金日成生前官邸及死后停陵处）、位于风景胜地妙香山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礼品博物馆，参观了中朝友谊纪念塔、平壤人民大学习堂、朝鲜历史博物馆，位于平壤市中心的170米高的金日成主体思想塔，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和为纪念金日成70寿辰建造的凯旋门，还参观了万景台少年宫、金正淑幼儿园、金正日的母校平壤第四小学和一所中学。此外，我们还游览了开城市的文物景点以及著名的板门店停战谈判纪念地，行程满满，收获不浅，感触良多。下面，我把个人见闻如实表述一下：

一流的楼台馆所

来朝鲜前就听说平壤的公共设施相当讲究，亲眼所见果然名不虚传。从飞机上俯瞰朝鲜大地，一片青翠中除了曲曲弯弯的乡间小路，几乎见不到现代化的公路。机场上仅停着两三架小型飞机，我们乘坐的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的麦道82客机成为机场唯一的“大鸟”，一时间好像从大都会来到了县城。一进入平壤市区，景致突变，高楼大厦错落有序，建筑与园林绿地交相辉映，很美丽的一座大城市！

按照朝方惯例，我们先被带到万景台大纪念碑前，向山坡上高高屹立的金日成铜像敬献鲜花并被要求深鞠三躬。万景台居高临下气势恢宏，金日成铜像高达23米，两侧由228个人物组成大型群雕，金日成立像背临70米宽的镶嵌壁画，高居山坡之上威严地俯瞰着平壤市色彩缤纷的建筑及植被群，每个前来朝拜者前后对望，在金灿灿的威严立像下势必莫名其妙地顿生自身渺小之感。

我国驻平壤使馆政务参赞宋先生告诉我们，近年平壤暂停了大兴土木，现在见到的市容与几年前相同。即便如此，平壤宽敞的公路、林立的高楼、众多的公园和洁净的市容，已经十分出色。当我们发出赞叹时，朝方翻译、年轻的金明姬小姐由衷地说：“住在平壤的朝鲜人是最幸福的。”后来我们了解到平壤的生活水平的确是朝鲜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的。金小姐告诉我们，当西海水闸（朝鲜重点水利工程，相当于我国三峡工程）建好后，为了表彰有功部队，金正日亲自批准让参加施工的功勋人员来平壤一趟，让他们乘坐卡车环绕平壤观光以示嘉奖，这是朝鲜最高待遇。苦战数年的官兵们面对高楼大厦鲜花绿茵的首都，“仿佛见

到了天堂一般，个个激情满怀人人泪流满面”。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朝鲜人民视为圣地的万景台旧居，1925年，13岁的金日成离开了这座位于平壤郊区的草房子，到我国沈阳读小学，他的父亲是地主的看坟人，当儿子出人头地时，苦命的父母已经亡故。走出故居，不远处是一个大型游乐场，里面有50多种巨型游戏设施，每天可接待10万多游客。为了使经常被要求前来参观故居的人们就近有个娱乐场所，或者是使人们即便在休息娱乐时也不忘太阳般伟人的恩泽，总之是金氏父子下令并拨款修建了这一偌大的现代化休闲场所。

我团下榻的青年宾馆是1989年建成的，是一座30层的塔式高楼，比邻的青年大街上云集着10座现代化的竞技体育场馆，虽然门可罗雀，但建筑造型各异、华丽美观。第三天傍晚，我们在其中一座体育馆的大礼堂里，观看了朝鲜国家杂技团的表演，我不喜欢欣赏杂技，但不得不为演员们高难度的技巧使劲鼓掌。

平壤市中心明显地仿造了天安门的格局。相当于城楼的是绿瓦飞檐的平壤人民大学习堂，正面是主席台和观礼台；相当于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的是朝鲜美术博物馆和中央历史博物馆；相当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是主体思想塔。8月24日上午，我站在人民大学习堂10楼平台向金日成广场眺望，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练队，他们高擎红旗和花束齐声呼喊万岁在胜利大街上走过来走过去。10年前金正日陪着他爹，周围簇拥着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兴高采烈地在此检阅百万游行大军。

眼前朝鲜人练队的情景，一下子勾起我遥远的回忆：青少年时期，我也曾一次次地走在整齐的方阵中从天安门广场经过，望着城楼上那尊看不太清楚的神人高呼万岁，泪眼婆娑激情难抑，如今我早已不信鬼神了。在即将来临的9月9日如何搞好庆典，是平壤人压倒一切的重任，平壤全市城郊共有200万人口，百万群众大游行意味着除老幼病残者外全体出动。几天来我们看到在所有空场上都排满黑压压的练队人群，学生们更是起早贪黑地演练着高难度的团体操，几天后他们将身穿国家统一发放的新式演出服，以极其严谨一致的表演接受领袖的检阅。时过境迁，10年前的慈父和他的老友们死的死，散的散，这次50年国庆大典没有邀请任何外宾，只能自己跟自己玩，仅仅为在9月5日将登上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宝座的金正日单独过一把最高领袖的瘾，朝鲜举国上下竟然不惜耗费如此

巨大的人财物力！

回过头接着说平壤的市容，著名的千里马铜像是1961年落成的，坐落在万寿台山岗下的路口旁，工农骑马跃进的铜像高46米，塔身用2500多块花岗石砌成，象征着朝鲜人民跨上千里马的英雄气概。现今它已经大为逊色了，巍然耸立于市中心的主体思想塔竟高达170米，工农与领袖不可相提并论了。8月24日下午，我们乘电梯来到距地面150米高的主体思想塔的瞭望台，头顶是20米高、昼夜通明的玻璃钢火炬。这座塔于1982年4月金日成70寿辰之际建立，象征着金日成提出的主体思想日夜通明、永恒不息。同期建造的还有凯旋门，由精雕细琢的15000多块花岗岩砌成，高60米、宽50多米，比巴黎凯旋门还要高出10米，上面雕刻着《金日成将军之歌》的词曲。

站在主体思想塔瞭望台上，平壤市容尽收眼底，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市区那座105层、搁置10年的金字塔形烂尾楼的框架——柳京饭店，当初飞速搭建的混凝土框架，在晴空丽日下彰显出别具一格的尴尬，既散发着金家独大之霸气，又透露出客源稀少、宾馆空寂、资金匮乏的窘境。十年了，肯接手投巨资兴建经营这豪华的超级大饭店的傻瓜富翁还没冒头，它是一个无言的证人，默默述说着朝鲜民族一段荒谬绝伦的不堪岁月。

8月25日中午，好客的主人盛情邀请我们到最负盛名的玉流馆品尝平壤冷面，玉流馆翠檐飞翘，装饰堂皇，食客如云。一楼接待国内食客，只见长长的队列排出门外好远；楼上专供外国来宾，价格陡涨8倍，依然是座无虚席。我素来喜食延吉冷面，18年前就是京城“冷面爱好者协会”一名热心会员，这次有机会尝尝正宗的平壤冷面，欣喜之情不言而喻。没料到吃进嘴里的是既牙碜又发黏的面条，浅浅一盘清汤中，除少得可怜的两三小撮面条，只有几片味道不佳的泡菜和切得极细的几丝鸡肉，邻座的《红领巾报》总编辑贺慎勇老弟不解地问我：“你怎么喜欢吃这种东西？”我难掩失望地对他说：“不解释了，回国我请你吃北京的延吉冷面，你就知道原因了。”

说起朝鲜建筑的富丽华美，莫过于平壤的锦绣山金日成纪念宫和妙香山的国际友谊展览馆。前者是金日成生前起居、死后停灵的地方，极尽宽敞富贵，举目都是通明透亮的磨光大理石，陈列着各国进献的勋章宝物，从进门到宫殿内都无需步行，有几百米长的自动扶梯和升降电梯。国际友谊馆建在景色秀丽的妙香

山深处，分金日成礼品馆和金正日礼品馆。展览馆没用一根木料，没安一扇窗户，从外面看却很像木质结构的巨大建筑，彩绘着很多窗户，用的建材全是大理石和花岗岩。硕大的水晶吊灯、手工织成的纯毛地毯和壁毯等高档装饰，为确保地面光洁，进门时所有人必须加穿套鞋，室内温度和光亮采用全自动调节，温度低的把穿夏装的我冻得嘴唇发紫。

展览馆内，分各洲、各国陈列着世界各政党、元首和社会人士向金家父子赠送的豪华礼品，自1978年开馆后礼品越来越多，从1989年扩建到如今的4万平方米，存放着169个国家、共209000多件奇珍异宝，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宝库。在中国馆里，我们看到在国内都见不到的各色珍宝，不少赠品价值连城，仅举两例：徐悲鸿的那幅雄鸡报晓图，上面有郭沫若手书的长篇祝辞。黄永玉画的那幅骏马图上有叶剑英元帅题写的“志在千里”几个苍劲的大字，这幅画原为叶府的镇宅之宝，叶帅生前亲自送给了金日成。展品琳琅满目，金的银的宝石的水晶的，有年代久远货真价实的文物，也有现代高新技术的工艺精品，令参观者大饱眼福。

让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志愿军的遗址早已破旧不堪，不少已经荡然无存，中国志愿军的英勇事迹在朝鲜无人提及，38万中国军人捐躯于此，如今仅留有一座1959年建成，后被人为毁坏，于1984年重建的友谊塔，素面朝天地在一座小山头上遭受冷落。8月23日下午4点，我在塔中观看记载着2万多名牺牲的中国将士的光荣册时，想起我的舅舅理光宇、我先生的叔叔周新潮，他们当年跨过鸭绿江血洒异国……思绪纷飞中，泪水夺眶而出。

末流的生活质量

我们代表团在朝鲜总共8天，除了小平壤，还去了北方的妙香山和南方的开城、板门店，长途驱车看到道路两旁的庄稼矮小稀松，大家都担心今年收成依然不好，百姓还得饿肚子。行程安排得很满，即便如此，8天下来我们人人思归。刚走出平壤海关，一位心直口快的团员就说：“总算要回家了，再住几天非神经了不可！”在朝鲜感觉难受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不敢讲话，二是伙食太差。

赴平壤之前就被告知，朝方监听系统十分了得，宾馆房间里、汽车上，甚至电梯内都有监听设备，去年我国一个政府代表团因为有人回宾馆房间后说了句

“合着这里的一切都成他们爷俩的了”，结果第二天收到正式警告，闹出外交纠纷，居然还被断了餐饮，提前打道回府。前车之鉴，出国前我们被再三告诫“决不能步其后尘”，但我们利用监听系统为己服务却屡有收获，反证这一系统确实存在。比如我们想买署名金日成的《与世纪同行》丛书，嫌定价太高，在宾馆住的房间内故意议论想看此书，两天后，朝鲜青年同盟主管外事的书记金景浩在会见我们时，送的礼物正是这套书！朝鲜经常停电，大宾馆里热水供应也经常中断，那些天气温高，我们每天只得用凉水洗澡。到了该洗头的日子，我们几位女士故意在屋里口出怨言“再不给热水，再不洗头受不了了！”“头发都有馊味了！”没过多长时间，果然供应热水了。有这些小插曲做调节也算有趣，但在国内过惯了放松洒脱的日子，突然间被迫言不由衷，大家都感觉很别扭。

这次出访，临行前团长让我带着两个年轻人在北京买了许多食品，肉脯、饼干、榨菜和方便面，还带来一大箱苹果和梨。在朝期间，每天早饭是米粥和面饼，中晚餐是四菜一汤，总是泡菜、煮茄块、豆腐和一小盘鱼，一盆加点黄酱的面条汤，晚餐有一瓶啤酒或日本产的葡萄酒。这样的伙食在朝鲜是很丰盛的了，主人已经尽心招待我们这个政府级别的代表团。只是多年来国内食品丰裕，我们的口味变得很高，再吃这些数量不足、清汤寡味的低劣饭菜很不适应，自带的食品都吃光了。在朝鲜吃从北京带来的普通水果，绝对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享受，曾遇到过一个英国某机构驻朝鲜的先生，跟他聊天，他告诉我“两年前自由市场偶尔有海棠果那么大小的苹果，如今根本买不到水果了”。我怀疑朝鲜人连饭都吃不饱，因为我负责管理团里的礼品和账目，有两次返回餐厅取提包，两次都看见朝鲜服务员正低头飞快地吃喝着我们剩下的残羹剩汤，那情景让人心酸，我曾悄悄把带来的食物给一位年纪大点的女服务员，见她害怕的模样我赶紧离开了。

朝鲜民众的生活究竟怎么样呢？我只能谈点走马观花的印象。首先感觉他们很受压抑，不敢讲话，街上的人一个个面无表情，很多人黧黑撮腮，一看就是长期营养不良。接待我们的朝鲜人里有一位30多岁的黄先生，他具有特殊身份，时刻留意察言观色却不说话，朝方的人明显都惧怕他，在他面前谨言慎行。当我们问一些有关金日成的问题时，朝鲜人闭口不谈，就像没听见一样。问起他们的工资收入或生活情况，也没人作答。女翻译金明姬小姐今年23岁，一边工作一边读研，当彼此熟悉后，她多次避开黄先生，一次次请我们团里的人帮助她介绍

一位中国男友。金小姐的父亲是平壤一个公司的经理，母亲在图书馆工作，家住市中心，算得上是一个中上阶层的家庭。她第二次请求我时，我问她找男友有什么条件？她赶忙说“没有没有，只要能把我去中国一起生活就可以！”我说：“你离开后，父母怎么办？”她说：“我们家人都同意我离开这里。”看得出她是真心实意想走出国门，但我们没人敢应承这事，她一旦离开，她的家人就惨了。

在朝八日，眼见平壤市民早出晚归，沉默寡言、脚步匆匆。他们每周上六天班，除了工作和政治学习，还经常练队。他们基本不用采购食品，也不必为看电视而耽误时间，每天却显得紧张兮兮的样子。下班的人都是两手空空，根本见不到我们这里大包小包往家里提的现象。据说他们多年来已经养成习惯，只要有点泡菜就能下饭，过年时能吃上顿肉就很不错了。前些年还能偶尔供应个把鸡蛋，这两三年已经断供了。我们在朝的8天里只吃过一次鸡蛋，被切成很细小的牙儿摆在平盘上，每人能分到大约四分之一一个蛋。平壤的电视只有一个台，总是在宣传金日成或金正日的丰功伟绩，晚上偶尔播出的电视剧也都是忆苦思甜，听说几年前播出我国电视剧《渴望》时，那段时间曾造成平壤万人空巷的奇迹。

平壤盖了那么多高层住宅楼，按户分配给每家110到180平方米的居室，但他们从来不请外国人去家里做客，原因是房间里基本空旷无物，根本没有待客的多余食物。10多层甚至20多层的居民楼都没有电梯，一律要步行往上爬，各单位分配住房，只有领导才能住在层数低的楼房，无职无权者一律住在高处。去年联合国官员视察时提出质疑“为什么一到夜晚居民区漆黑一片？”这之后金正日才命令给居民区供电，于是我们有幸见到入夜后平壤的万家灯火。

金日成确实是个人才，长期以来朝鲜的国民经济几乎全凭他高超的外交手段，用制止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和维护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利益的名义，从苏联、从我国、从东欧各国源源不断要了许许多多东西，过了多年舒服日子。自从苏联解体、金日成去世后，绝大部分外援猝然中断，朝鲜人民开始“苦难行军”，金正日把多年主管农业的劳动党副主席当做替罪羊，尸体竟然被打成千疮百孔。他们骂美帝骂苏联也骂中国，过去给他们的无私援助从不提及，拒不承认。我们坐过一次平壤地铁，惊讶地发现它竟然建在地下100到120米的深处，每一站都有双向自动扶梯，不同风格的华丽站台，宽敞舒适的车厢。因为我以前曾听说中国为援建朝鲜地铁花费了巨大的人财物力，所以我故意询问朝方陪同人员：“这么漂

亮的地铁是哪国援建的？”对方马上回答：“是我们朝鲜人民军建的！”口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8月27日下午，我们到金正淑幼儿园参观，接待我们的副园长中文说得很好，我负责分送礼品，她对我很客气，参观结束时我故意走在最后边，找机会问副园长：“孩子们这么乖，正是淘气的年龄，居然一动不动，这不可能啊？”副园长见周围没有人，小声对我说：“不能不听话，第三次被点名提醒，全家将被清除出去。”我吃惊地张大嘴巴，不敢再说话了。进入朝鲜的第一天我们就听说，平壤刚进行过一次清洗，趁夜一卡车一卡车地把“有问题”人员的全家都拉到边远的劳改农场去，被清洗人员的命运不言而喻，哪里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奇特的一二三

此次访朝，我总结出朝鲜最奇特之处有三点：一是一个主体思想；二是两朵花；三是三个人物。主体思想是由金日成首创、由金正日丰富并发展的指导思想，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人是人民群众，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也在于人民群众”。看了后两条就知道与第一条刚好互为悖论。

两朵花是朝鲜人视为最神圣的“金日成花”和“金正日花”，我们在朝鲜见到的图画、刺绣等工艺品，或者是大门、建筑物上的浮雕，都是这两种花的图案。前者据说是金日成参观印尼一座植物园时，见到一种玫瑰红的热带兰花，随口说了句：“这花很漂亮，以前我没看见过。”印尼园长为使他高兴，说：“我把它命名为金日成花吧。”后者是日本园艺师栽培的一种开大红色花朵的花，有个日本人为讨好金正日，告知这种花在日本学名是金正日花。逢场作戏的恭维被朝鲜马屁精当真了，我在万景台少年宫刺绣组，见到女孩子们都在专心致志地绣着这两种花，小学和中学校园里陈列的绘画作品也是这两种花。

三个人物当然是金氏父子，再加上金正日的生母金正淑，朝鲜所有新人物画像全是这三个人。参观朝鲜中央美术馆时，一进门的大厅里是他们三人的大幅画像，馆藏品按照朝鲜历史时期分几个展厅，高句丽厅有反映王侯贵族生活的墓葬壁画；高丽王朝厅里有水墨字画，是公元918年到1392年间当地社会生活的缩影；在李氏王朝厅里有四季美人图等鲜活的彩色绘画，一进入现代展厅，全是金氏父子或站或坐、或全身或半身的画像和一幅金正淑穿军装的全身立像。走廊

里有几幅宣传画，很像我国文革时期的政治宣传画，画的是工农兵高举红旗向前进，上面的口号是“夺取艰苦行军的最后胜利”。走出美术馆，我轻声对同伴卢晓丽说了句：“朝鲜的艺术已经断代了。”

不管在哪里，你都能一眼分辨出谁是朝鲜人，他们一律在右前胸处佩戴着金日成像章。但是这种像章商店里买不到，由各单位在极其隆重的场合中郑重颁发。所有朝鲜人在公众面前都非常敬爱自己的领袖，不光口口声声“热爱领袖”，在向领袖画像深深鞠躬之前，人们会习惯性地整理好仪容。那天绕水晶棺后，离开金日成遗体陈列大厅时，前面两位朝鲜阿妈妮一直失声痛哭，我们的团长赶紧搀扶住其中那位头发花白的妇女，看她俩哭得那么伤心，谁又忍心怀疑朝鲜人民对领袖的忠诚呢？

8月27日上午，朝鲜青年同盟（全称：金日成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的书记在会见我们时，郑重地说：“我们全体青年同盟团员一致拥护伟大的领袖金正日同志。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把800万青少年培养成800万颗领袖的枪炮弹！”当天下午，我们接连参观了平壤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得以充分理解有关“枪炮弹”的含义。原来，朝鲜儿童从两岁半进入幼儿园起，每天接受的教育全部围绕着领袖如何伟大，如何无限忠于领袖，刚学会说话的幼儿们，围坐在万景台模型前，一遍遍地跟着学说“这里是慈父领袖诞生的圣地”。每所学校里都把最好的两间教室作为“金日成革命事迹研讨室”和“金正日革命事迹研讨室”，学生们演出的文艺节目也都是表达对领袖的无限热爱与忠诚。朝鲜要求人民把“做领袖的孝子”和“做领袖的枪炮弹”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扪心自问，我是把人生看做体验生活、探索知识、追求真理，相比之下朝鲜人的命运太悲催了。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在真理和认知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嬉笑中垮台。”归国途中，交流体会，不约而同地庆幸我们的祖国走出了闭关锁国和个人迷信的误区，真乃民族福祉！

最后想说，朝鲜儿童非常可爱，白皙鲜嫩如同花朵一般，他们应该获得美好的明天！📷

【百年中国】

“4.8 民族宫事件”的蝴蝶效应

胡宗式

“4.8 民族宫事件”和“4.11 事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事件的起因本来是一个在文革中司空见惯的批判会，但它却引发了一连串的严重事件。这些事件在1967年9月就已经有了结论，笔者也就没有再去研究它们。近期，一位研究文革历史的朋友关心这件事情并提出一些疑问，笔者就此作一回顾。

我所了解的“民族宫事件”

“民族工作展览”是文革前就有的，地点设在民族文化宫。在北京师范大学批判“工业学大庆展览”、“农业学大寨展览”得到高层赞扬的影响下，“民族工作展览”成了一个可以开展“大批判”的靶点。

民族文化宫的一个群众组织“民族文化宫二·七革命造反团”，一般简称为“二七兵团”（下同），很早就想批判这个展览，但是受到许多阻挠。1967年3月31日晚，该组织发表声明，正式提出要批判这个展览。此事得到了新北大公社、民院抗大、轻工红鹰、北外红旗等群众组织的支持。新北大公社不可能与抢档案的洪涛、刘郢那一派为伍，支持“二七兵团”是很自然的事情。

鉴于批判这个展览只涉及文革前的“走资派”，符合“大方向”，新北大公社总部不认为这件事情有什么风险，也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有多重要，想得比较简单。听说“二七兵团”里工人较多，就派了几个中文系同学去帮助写写批判文章，整个工作当然由“二七兵团”主持，他们是主人。

4月1日下午，“二七兵团”在民族宫大厅举行了一个誓师大会，大会的名字有点长，叫“民委系统革命委员会庆祝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和声讨刘邓在民族工作中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誓师大会”，与会者在会后进馆批判并举行游行。这次进馆主要目的是看看展览的具体内容，为下一步批判活动做准备。新北大公社派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包括参与写文章的人员），其他学校有没有人参加，笔者无从了解。这天的活动，北大动态组的一位同学去看了看，回

来后他简单介绍了所见展览的情况，说是见到了真正的可以称为“牛鬼蛇神”的图片。数十年后推测，这大概是某宗教的神像照片。

见到“二七兵团”的声明后，对立派“东方红公社”于4月1日上午也急急忙忙发表声明，也要对该展览展开批判。他们大概还没有部署好，所以这天没有发生冲突。

4月4日，民族宫二七兵团、民院抗大、新北大公社等十九个单位发表联合声明，组成了“批展联委会”。年代有点久，笔者未能找到这份声明的文本。

4月5日，“批展联委会”在民族宫召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北大去了50来人参加大会。这次会议受到了洪涛等控制的“红色联络站”的冲击。¹这说明对方上层（至少在洪涛、刘郢一级，甚至更高一级）坐不住了，他们拿定主意，要对我方的“批展”活动实施打击。参加这次大会的同学是数力系的，不了解情况，而新北大公社总部却没有人参会，没有给予重视。

现在回顾，刚刚成立一个多月的新北大公社总部认识不足，没有太当回事，以为派几个人去帮助写写文章、开大会时派些人去充充场面就行了，没有估计到这将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更没有估计到对方会动员其全部力量，大打出手。

据《新北大》的报道，4月8日上午九点半，经民族文化宫二七革命造反团、东方红公社和警卫排商定，允许双方带自己的人进馆参观，进行批判。²

如果这个“商定”能够得到执行，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冲突。这个“商定”，估计是个口头协定，笔者当时不在场，《新北大》的报道，笔者认为是可信的。

据《新北大》的报道，4月8日上午9点半，我方二七兵团、民族学院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等组织约70—80人，按规定来到展览厅，但对方东方红公社单方面撕毁协议，拒不开门。经几次交涉无效，我们迫不得已锯断了综合馆大门的铁锁，高声朗读主席语录进入展览馆。

有人指责锯锁的人是新北大公社的，但没有提出证据。笔者不在现场，不知道这锯锁的人到底是谁。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不是大会，北大没有另外派人参加，北大在场的人就是几个去帮助写文章的学生，他们手中只有笔，没有锯锁工具，

¹《一个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洪涛，地院东方红等一小撮所制造的“四·八”和“四·一一”事件真相》，载《新北大》报1967年4月13日；此文亦收入胡宗式、章铎编：《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上），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

²《一个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洪涛，地院东方红等一小撮所制造的“四·八”和“四·一一”事件真相》。

他们也没有资格去锯外单位门上的锁。锯锁者应该另有其人，锯锁也是对方毁约引起的。比起洪涛一伙后来挑起大规模武斗，“锯锁”行动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锯了一把锁，没想到结果是撬动了吴传启、洪涛这个利益团伙的基石，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实施反击了。

对方的反击是有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的。

上午约11点钟，对方调来了民院东方红、民族歌舞团“八·八造反者”和民族研究所“千钧棒”战斗兵团、地院东方红等组织约200—300人。他们以“你们是‘保’字号的，无权批判，无权参观”等“理由”，不仅用暴力把我方人员拖出展览厅，还要继续把事情闹大。对此，《新北大》的报道有详细记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

应当指出，洪涛是民族研究所的造反派头头，也是“学部联队”的头头，“千钧棒”战斗兵团是他直接操控的，民院和民族歌舞团的两个组织都是听从洪涛号令的，地院东方红是洪涛一伙的支持者，他们要为自己支持的一派出头了。4月8日上午，“学部联队”还只是下面的战斗队出头。到当天晚上的武斗，洪涛就在现场指挥了，这是洪涛后来自己供认的。

从下午开始，对方有组织有计划地增加人马，企图将民委机关北楼包围起来。其最终目的，显然是要占领这座大楼，彻底扼杀我方“批展”的活动。（注：民委在民族宫的后面，是一个大院，有几座楼，“二七兵团”的办公室应该在北楼，参与“批展”工作的其他单位人员是否住在那里，或是每天自行往返，笔者不了解。进入民委有单独的大门，不必走民族宫。）

下午4点多，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一群人砸了京剧一团沙家浜剧组之后，又奔往民委。加上调来的其他单位人员，对方合计约三千余人。

新北大公社、北外红旗、石油大庆、轻工红鹰曾各派一人主动找对方谈判，但无果。晚六时，传来了“红代会两项命令”。地院东方红有人暴跳如雷，说：“两项命令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¹

4月8日临近晚饭时，笔者从学校的广播中听到参加“批展”的同学向校内告急并要求支援的消息。晚饭后，公社负责人卢平带领约50人乘坐一辆大轿车

¹ 同上。

前去民族宫支援，笔者也随车前往。在整个事件中，新北大公社只去了这一点人。当我们来到民委大院外时，看见民委大院内外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这时对方还没有完成包围行动，我们仍可进入楼内。

4月8日晚10点半，对方开始行动。他们先割断了我方所在楼的对外的电话线，然后开始砸门、砸窗、冲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驱赶我方人员。他们从楼里到楼外部署了大量人员，排成两排，一直排到通向长安街的大门。我们一个个被从房间里拖出来，经过两排人墙的推搡，一直推出大门，来到马路上。期间遭到拳打脚踢吐唾沫，有同学胸前口袋插有钢笔，也被抢走。整个行动持续了数个小时，对方占领了整个大楼。到9日凌晨4点左右，我方人员被全部赶到马路上。

晚12点，戚本禹的秘书张根成来过现场。他说：“我的意见是双方立即撤出！”对方指责张根成“和稀泥！”

9日凌晨2点半，中央文革派代表和吴德、聂元梓在民族宫二楼召开会议，向各方代表传达中央文革指示，并要求各方“马上撤出民族宫、民委”。会上，对方代表拒不服从指示，还破口大骂说：“聂元梓、蒯大富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骂不得？”“聂元梓算老几？我们要恢复三司！”“北大一月份以来，大方向就是错了！”

实际上，他们的驱赶行动已接近完成，在民族宫二楼召开的会议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967年4月11日出版的地质学院《东方红报》，刊登了题为《“民族工作展览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的文章，署名为：中央统战民委系统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合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民族文化宫“东方红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

这期小报还刊登了如下“简讯”：

四月八号，我东方红战士与民族文化宫东方红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统战部红色联络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以及政法公社、农机、林院、工大、邮电东方红等单位的亲密战友在民族文化宫共同战斗，狠狠地痛击了一小撮保皇党的猖狂挑衅，争取和教育了一部分受蒙蔽的革命群众组织，

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从小报刊登的名单上，吴传启、洪涛这条线清晰可见，吴传启们的“学部联队”公开登场了。历史证明，这是“学部联队”走向垮塌的起点，用不了多久，随着吴传启等人的逃亡，“学部联队”就要“收缩”了。到这一年的9月份，“学部联队”就土崩瓦解了。

1967年4月13日出版的校刊《新北大》刊出《一个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洪涛，地院东方红等一小撮所制造的“四·八”和“四·一一”事件真相》的文章。笔者不了解该文的写作过程，但编辑们并不缺乏第一手材料。关于“4.8事件”，北大有参加“批展”写作的多位同学，有参加“批展联委会”的其他组织的成员，他们是亲历者，了解事情的前后经过；还有数十名当夜被从民委楼里用武力驱赶出来的同学，他们可能不了解之前发生的事情，但他们是当天夜里被武力驱赶的亲历者；而“4.11事件”就发生在北大校园内，文章的写作者是亲眼目睹的。在今天看来，文章中的某些提法或措词有所不妥（如把地院东方红称作保皇派），但叙述的事实，基本是真实的。

对聂树人回忆的质疑

聂树人在其回忆录《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一书有关“4.8事件”的一节中指责《新北大》的文章“编造谎言，歪曲事实，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那么，到底是谁在编造谎言，歪曲事实，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呢？

聂树人将《新北大》的文章摘要后写道：

请读者注意，孙蓬一在这里说的：“一些组织，特别是地院东方红的一小撮人，把矛头指向红代会，指向新北大，指向聂元梓同志，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按：经查，这是《新北大》文章里的话，不是孙蓬一说的话。）

“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地院东方红一小撮人，把矛头指向红代会，指向新北大，指向聂元梓同志”，都说得很对，我们一概认账。

聂树人“一概认账”，很好。他们仅仅是对红代会、聂元梓和北大不满吗？红代会是中央让成立的，聂元梓这个红代会核心小组组长也是中央让当的，北大是毛泽东打倒陆平、撤走工作组之后产生的，地院东方红的一些人对这些都不满，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和中央不满。他们承认他们知道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圣意”，也承认“自己暂时无可奈何”，但拿聂元梓做目标搞破坏是一定要做的。

聂树人承认“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很好。但这一次他们站到了关锋、吴传启、洪涛、那条线上，而且帮了一个倒忙。

聂树人对红代会和聂元梓在红代会的工作非常不满，文字颇长，兹不赘引。笔者不了解红代会内部的矛盾。从聂树人的文字看，他之所以不满，就是他们不能像过去“三司”那样为所欲为了，念念不忘以他们“为核心”的“三司”，念念不忘要恢复“三司”。但这个应该和中央文革去交涉，指责聂元梓是没有用的。实际上，尽管红代会被搞得名存实亡，但他们恢复“三司”的目的也没有实现。

聂树人引用《大事记》¹有关“4.8事件”的文字说：“这个事件是北京以后两大派形成的导火索和公开化”。

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两派的产生，是关锋、吴传启一伙拉帮结派造成的。北大的一些同学，在1967年1月就已经看明白这一事实：“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已经形成了。至于导火索，“4.8事件”成了聂元梓、孙蓬一4月10日向中央文革揭发关锋、吴传启结党营私的导火索；而“4.11事件”，则成了孙蓬一4月12日讲话公开揭露阴谋团伙的导火索。

聂树人指责新北大公社：

“新北大公社”是不久前才成立的组织，依附于“北大校文革”。它没有造反（反工作队）的经历，不知道什么是造反，更不知道如何识别造反派组织。却打着造反的旗号，到处乱打乱撞。

聂树人以为自己反工作组的经历非常了不起，但他已经忘了或者根本不知道

¹ 这个《大事记》即《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作者是以地院东方红为主的“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该大事记令《新北大》编辑部的人很生气，他们曾组织人打算另编一部大事记，后来工人宣传队来了，就散了。

地院东方红在反工作组时曾经求助于北大的历史了。孙蓬一在4.12讲话中提到，“我们并不想夸耀我们北大什么功绩，但是，既然有人尖锐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我们也不妨简单地说他两句。就以地质东方红为例，他们在最困难时期，我们北京大学的革命派支援了他们。从聂元梓同志开始到我们广大的同志，支援了他们。我们做得很不够，但那是我们努力的问题。但我们的心和那个时候的地质东方红革命造反派连在一起的。”

聂、孙等人此前从未公开宣扬过这些事情，北大学生基本上一无所知。但是，聂树人及其同事能否认这一事实吗？

聂树人等人自以为很善于识别造反派，那他们又是怎么识别的呢？他们前脚刚刚获得北大校文革的支持，后脚就把反对校文革的北大“井冈山”拉进了“三司”。在他们眼里，吴传启和洪涛们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被这伙人利用是很光荣的事情，可结果呢？

新北大公社确实不知道如何识别“造反派”，但确实认识到吴传启这样的国民党和洪涛这样抢档案的人决不是造反派。

聂树人讥讽新北大公社“乱打乱撞”，但事实好像不是这样。新北大公社参加“批展”，一下子就触到了洪涛们的痛处，这是“乱打乱撞”？新北大公社一些人对洪涛们观察已久，对“批展”也作过评估，认为不会涉及洪涛本人，但还是没有估计到洪涛及其同伙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洪涛跳出来亲自指挥武斗，“学部联队”也出场助威，那么，随后的事态发展，就由不得他们了。

聂树人讽刺说：“聂元梓要‘立新功’了，她也想仿照北京师范大学，造展览馆的反。”

聂元梓要“立新功”？那太容易了，面对关锋、吴传启、卢正义一伙结党营私的猖狂行为，她只要装作看不见，不说话就行了。聂元梓如果同他们打成一片，那“功劳”就更大了。但是，聂元梓不仅认定他们是“隐患”，还要揭发他们，反对他们。于是，她就成了这个团伙的眼中钉和绊脚石。

至于“造展览馆的反”，这是新北大公社总部那些人干的，并不是聂元梓让干的。

按照聂树人的指责，聂元梓、孙蓬一的一大错误是：“他们要藉‘民族宫事件’，大发他们欲夺而不能夺的北京市大权之慨！于是，他们要‘揪摘桃派’，

要‘打倒谢富治’。”

聂树人指责聂元梓、孙蓬一要夺北京市大权，有什么证据呢？在市革委会里，聂元梓是孤身一人，找得出第二个北大的人吗？北京市革委会还在筹备的时候，许多权力实际上已经落到关锋、戚本禹、吴传启、周景芳那一伙人手里了。关、王、戚垮台后，北京市革委会清理出去了多少人？这些人又都是谁塞进来的？又是怎样塞进来的？聂树人能解释清楚吗？对于这一严重问题，包括聂树人在内的一些人，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受到周景芳的拉拢，身在其中，已经没有识别能力了。

聂树人的指责高看了孙蓬一。“摘桃派”是孙蓬一说的，指的是吴传启一伙，不包括谢富治。他对谢富治处事不公有看法，但从未说过要“打倒谢富治”（即使是4月13日他在大会上发牢骚，也没有说一句“打倒谢富治”）。聂元梓、孙蓬一1967年4月10日向中央文革领导人进言，并未提及谢富治，而且，戚本禹也是在场的。聂、孙的认识，也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聂树人说“孙蓬一、聂元梓连这点常识都不具备，只能说他们利令智昏！”利令智昏的人确实有，那就是关、王、戚、吴传启、洪涛一伙。不过，地院东方红给他们帮了个大大的倒忙。

聂树人说：“‘民族宫事件’是‘地派’院校对聂元梓镇压北大造反派的一次大声讨，大示威。”这句话说出了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在干涉北大内部事务的野心。而聂树人眼中的“北大造反派”，不过是盲目的投机者和某些人的工具而已。

在“4.11事件”一节中，聂树人写道：

王大宾没有参与“4.8事件”。（按：无法判断真伪。）

4月9日，王大宾与唐咸正、陈宝堂去北大，会见聂元梓，说明真相。双方以“误会”平息了事端。（按：这是谎言。）

不想，聂元梓口头上答应了，但却在校园里展出“4.8事件”中被撕毁的衣服，丑化、诬蔑“地质东方红暴徒”，极力扩大事态。（按：北大学生在自己的校园里展示“4.8事件”中被撕毁的衣服，并没有拿到地院去展览，聂树人为什么要暴跳如雷呢？6辆广播车开进北大，才是真正的挑衅和扩大事态。）

为澄清事实，“地质东方红”广播台“高旗无畏”战斗队开着宣传车进入北

大，以翔实的事实予以反驳，并说明真相。结果，广播车被砸，人被打伤。（按：据聂树人的文字分析，这辆广播车是9日来北大的，笔者没有查到可以证明这件事确实发生过的任何资料。）

为不使事态扩大，4月11日下午，王大宾与陈宝堂等，再次去北大，想和聂元梓商谈平息这件事。他们不仅没有找到聂元梓，还被“新北大”学生包围了起来。陈宝堂冲出包围圈，回到学校，将“王大宾被扣”的消息传回了学校。（按：这也是谎言。）

此事激怒了“地质东方红”和原“三司”院校。地质、农大、农机、政法、邮电、北工大、林学院等原“三司”院校派出宣传车和部分学生去北大。聂元梓自知理亏，关上大门。地质东方红“红色尖兵”负责人陈宝堂等翻院墙进入，打开东门，人们一涌而入。（按：这不是打上门来寻衅是什么？但聂树人的说法与实际不符。北大南校门是敞开的，六辆广播车就是从南校门进入的，并一字排开停在南校门到大饭厅的马路上。北大同学忍无可忍，将广播车的喇叭线扯断，将车推出南校门。广播车外面有所在学校几层人的保护，确切地说，是连人带车一起推出南校门。不存在砸广播车的事。至于“翻院墙进入，打开东门，人们一涌而入”的事件，发生在当天夜里至次日凌晨，是继广播车寻衅之后的第二次打上门来的事件。）北大多数师生欢迎我们，（按：睁眼说瞎话。）而“新北大公社”的一些人却指责“地质东方红”滋事，不仅打“地质东方红”的人，还去公安部告状。（按：既然北大多数师生欢迎他们，他们的人怎么会被打呢？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学生确实被外校的人殴打，衣服被撕烂，他在大饭厅的聚会上控诉他所遭受的暴行，展示了他被撕烂的衣服，而这位同学，当时还不是新北大公社的成员。这是笔者亲眼所见的事。）

事态进一步扩大……

《大事记》是这样记述这个过程的：

4月11日，民族宫事件继续发展。

“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派宣传车去北大。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某些人煽动同学砸了宣传车，打伤了前去宣传的人员，发生了痛心的“4.11事件”。

之所以要引用这么大段的文字，是因为“4.11事件”是一起重要的历史事件。这段文字也是地院东方红的某些人用谎言欺骗群众到北大校园里寻衅滋事的自供状。

对于这样一起重要的历史事件，聂树人在回忆录中基本上不提供任何证据。

关于4月9日王大宾等人会见聂元梓一事，聂树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聂元梓何时何地会见了王大宾等人？北大方面参加会见的还有谁？王大宾既然“没有参与‘4.8’事件”，他能说明什么真相？聂元梓已经亲临现场，亲耳听到对她的谩骂，用得着王大宾再重复一遍吗？

历史的事实是：被强行赶出民族宫的北大学生，到9日早晨才回到学校。¹ 4月9日，北大的决策层开会讨论当前形势，商议行动方针并决定写信求见中央文革领导人。从后来了解到的情况看，这个会议讨论了向中央文革领导人揭露关锋、吴传启一伙结党营私的问题，与会人数肯定不多，但时间不会短。如果真有王大宾来见聂元梓，则一定会被其他人知道并留下文字的或口头的痕迹。就我们至今能找到的文革资料来看，根本没有“王大宾来北大”的文字记载。新北大公社总部的一位同学回忆，他从未听说过王大宾来北大的消息。

王大宾在其回忆录中曾详细记述了他与另外六人于1966年7月27日（反工作组时期）来北大见聂元梓的情况。对于1967年4月11日发生的重大事件，他肯定会有深刻的记忆。但在他的回忆录里，只有对“4.11事件”的叙述，并没有“来北大要见聂元梓”的文字。聂元梓有时在外边开会，不在学校。王大宾要找聂元梓，不得打个电话约个时间吗？

1994年1月1日，王大宾看望聂元梓。在场的一位北大校友对王大宾与聂元梓“热情拥抱”印象深刻，并给聂元梓、王大宾照了合影（笔者已收到此合影）。期间，这位校友问王大宾：“4.11事件是怎么一回事？”王大宾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却说了一句：“那天我没有来北大。”

由此可见，“4月11日下午‘王大宾被扣’”是伪造的信息。退一步说，如果王大宾与陈宝堂那天确实来过北大而没有当众亮明身份，北大没有人会包围他们。如果亮明了身份和来北大的意图，北大不少学生还是知道王大宾的，他们会领着他去校文革办公室或新北大公社总部。人们会奔走相告，会有传言，然而

¹ 刊登在《记忆》132期上的“扬子浪文革日记”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王大宾真的“被扣”，也一定会留下痕迹，不会连一个字的报道、一句话的传言都没有。现成的一个当时就众所周知的例子是：4月11日晚上，清华井冈山一位总部委员来到北大，混在大饭厅聚会的人群中高声表态谴责北大，遭到北大学子的围攻，清华井冈山总部为此还发表了声明。

笔者以为，“4月9日王大宾等人会见聂元梓”，以及“4月11日下午‘王大宾被扣’”的说法，没有任何材料证明其真实性，显而易见，这都是为了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北大寻衅以扩大事态而编造出来的谎言。他们背后有什么势力在发挥作用，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4月8日晚和4月9日，王大宾和地院的领导层在忙什么呢？多年后，笔者看到地院伏庆是¹的回忆：

（4月8日）大约晚上8、9点钟，中央文革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沙家浜兵团是江青同志支持的，与他们发生冲突是错误的，要我们答应他们的一切条件，送他们回去。我和张海涛这才给他们讲了许多好话，派车把他们送走了。（按：王大宾显然不在学校，那么他在哪里呢？）

次日晚，中央文革为此事在政协礼堂召见我院和其他几个学校的代表，我也去了。原本是戚本禹和大家谈的，等了很久，不见戚来。最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工作人员代表戚向大家介绍了北京京剧团的情况，说过去你们不了解情况，与他们起了冲突，不怪你们，就算了，今后可不行，下不为例。²

地院东方红那些人在搞民族宫武斗之前，先打砸了沙家浜剧团，还绑架了剧团的人。中央文革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如此纵容，难怪他们自以为天下第一了。

根据伏庆是的回忆，笔者认为：王大宾应该参加了4月9日晚上中央文革召集的会议。那么，白天他在忙什么呢？忙着为打砸沙家浜剧团的事善后？他有时间来北大吗？总之，伏庆是没有说王大宾到过北大。

在《王大宾回忆录》中，笔者看到如下文字：

1967年4月，地院东方红介入外单位运动，还有影响的一件事，为调查了

¹ 伏庆是，北京地质学院63级学生，文革中曾任地院东方红办公室主任、地院革委会委员、革委会办公室主任。

² 伏庆是：《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载《昨天》2017年11月30日第101期。

解北京京剧一团沙家浜剧组两派群众组织对立的情况，与其中一派群众组织也发生了肢体冲突。其中虽有许多因误会而情况不明扩大了事态，但现在反思，当年那种自认为地质东方红才是最响当当的造反派，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谁也不放在眼里。《沙家浜》剧组虽是江青亲手种植的样板田，也敢捅它一下马蜂窝的做法，也是应该反省的。这种事，肯定是得罪了江青的。清查“5.16”运动时，这就成了我反江青的罪行之一。¹

“4.11事件”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南门内和东门内发生的两起事件，以及对方某些人的言论和贴的大标语。当天下午，地院等院校的6辆广播车从南校门闯入北大校园寻衅，被北大学生推出校园。当日夜间，他们又有大量人员从北大东门翻墙进入北大校园，北大东门内是大操场，没有学生宿舍，平日里夜间很少有人，他们抓住了三个北大学生开了斗争会，三个北大学生被拳打脚踢，撕烂衣服。把这两起事件或颠倒时序，或混为一谈，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可曾有北大的广播车去别的学校寻衅？可曾有新北大公社的人到别的学校去抓人打人？

6个院校的广播车闯入北大寻衅，随后又有数百人打上门来，谁在给他们出主意？谁在给他们打气撑腰？

笔者以为，这或许是对聂元梓、孙蓬一1967年4月10日揭发关锋、吴传启团伙的一种反应。到北大寻衅闹事的人并不知道真正的内情，他们是被别人蒙骗和利用的。

聂树人对北大的事情实际上是不了解的。但“三司”“造反派”的心结死死地蒙住了他的双眼，使他不辨是非，甚至不惜编造谣言对聂元梓、孙蓬一和新北大公社进行无端攻击。“‘火烧英代办’，完全是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学生干的”，²就是聂树人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的一个典型例子。

“火烧英代办”是1967年8月22日晚至23日晨发生的事情。这是文革极左路线蔓延到外事系统后造成的恶果。

对新北大公社来说，1967年的8月是一个黑色的月份。自陈伯达6.5讲话以后，北大就进入了一个动荡、分化、改组的时期。反对派在校外势力的支持下，

¹ 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第130页。

² 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第168页，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

大吵大闹，并在8月17日合并成立了“井冈山兵团”。一些人利令智昏，以为他们推翻校文革、夺取北大大权的时候到了，正吵嚷着“抓黑手”，好乘乱夺权。新北大公社摇摇欲坠，聂元梓焦头烂额。在这个时候，聂元梓怎么有可能去领导天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呢？所谓“天派”的“清华井冈山”团派和“北航红旗”听聂元梓的号令吗？“清华井冈山”团派和“北航红旗”参与了这起事件吗？

对于这起震惊中外的事件，笔者一直不甚了了。数十年后读到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一书第七章的有关介绍，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才有所了解。

从卜伟华的书里可以知道，1967年8月初，北京外语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单位联合组织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修联络站。笔者不清楚参加这个联络站的群众组织到底有哪些，可以知道的是：有外语学院的“红旗造反团”和“六一六红卫兵团”，有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有北师大“井冈山”。指挥他们的，大概是外交部内部某些极左的、紧跟王力的干部。

8月22日晚，这个反帝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

北师大“井冈山”参与了这个活动。《师劫》（黎云编著）一书第511页写道：“谭厚兰率‘井冈山公社’参与”。陆伟国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载《记忆》第202期）中提到，“新人大”人员有参与。

清华“四一四”也参与了这个活动。卜伟华引用了韩丁《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的一个段落，笔者转引这个段落开头的一句话：“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四一四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四一四也是地派的。”

清华大学的孙怒涛在给《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写道：

也是在1967年的8月下旬，“地派”联络站组织属下的造反派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声讨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犯下的暴行。当四一四驻联络站人员向我请示

四一四不参加这次行动时，因一把手沈如槐当时正在外地，我拍板决定参加。于是，四一四成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件涉外大事中的积极参与者。

不知道孙怒涛说的这个“‘地派’联络站”是不是就是那个“反帝修联络站”，如果是的话，那聂树人真正是倒打一耙了。

笔者以为，事件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反二月逆流”的“打倒派”中那些极端的要坚决打倒陈毅的那些人。

事实证明，聂树人的话是不可信的。

对《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970年）》的质疑

由蔡新平、田春林、伏庆是策划，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于2019年1月出版了《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这是一本新书，笔者谨将其第一篇《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970年）》（作者：张运钧、李颖）中有关“民族宫事件”的记述抄录如下：

1967年4月8日~12日 民族宫事件引发天派、地派分歧公开化。

1967年4月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发生了轰动全市的“民族宫事件”。……双方僵持到第二天凌晨，中央文革派人来调停，北大和地院的人陆续撤离现场，并未发生武斗。这是地院成立革委会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当时，地院革委会包括王大宾在内几个负责人都先后到现场，在现场指挥的是杨雨忠。1967年4月9日王大宾与唐咸正、陈宝堂等去北大会见聂元梓，并向她说明真相。双方以“误会”平息了事端。但是北大校园里却展出了“4·8事件”中被撕破的衣服等实物，及文字材料，极力扩大事态。地院东方红得知情况后，“高旗 无畏”战斗队开着宣传车进入北大，进行反驳和说明真相。结果地院广播车被北大的人砸了，人被打伤了。为了不使事态扩大，4月11日下午，王大宾与陈宝堂等人再次去北大，想和聂元梓商谈平息这事。他们不仅没找到聂元梓，反倒被“新北大公社”的人包围起来。陈宝堂冲出包围，回到学校，将王大宾被扣的消息带回地院。这事激怒了地院东方红和原首都三司的院校。地院、农大、农机、邮电、政法、北工大、林学院等院校立即派出广播车和人去北大增援

地院。（按：6辆广播车进入北大是下午至傍晚间的事，是从南门进入的。）一开始，北大东门关闭，不欢迎他们进入北大。后来这些人进入北大后，双方又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流血事件。（详见参考文献16）（按：从东门翻墙进入北大是另一起挑衅事件，发生在当天夜间至次日凌晨，同广播车进入北大不是同一回事。）……多少年后，聂元梓曾说：北京高校群众组织分成天派、地派，天派的后台是江青，地派的后台是王关戚。（详见参考文献5）王大宾就这事在回忆录上写道：“1967年4月，在民族宫展览问题上，发生了地院东方红支持一派群众，与北大新北大公社支持一派群众的严重对抗肢体冲突，首次引发了北京红代会内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学校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和对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对此事，作为当年地院东方红公社的一把手，我一直深感愧疚。”“实践证明我们没能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详见参考文献5第165-167页）

半个多世纪后出版的新书对民族宫事件并没有提供新的史料，上述文字括注的“参考文献”只有两种，即聂树人的《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和《王大宾回忆录》。对此，笔者有如下疑问：

1. 关于4月9日和4月11日王大宾两次来北大的说法，笔者在前面已经作了分析，不再赘述。大事记的编者完全抄录了聂树人的文字，继续传播错误信息，没有考查、说明真相。

2. 必须指出，大事记写道，“这是地院成立革委会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当时，地院革委会包括王大宾在内几个负责人都先后到现场，在现场指挥的是杨雨忠。”而聂树人却说“王大宾没有参与‘4.8事件’”。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王大宾的回忆录则是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到底去没去呢？既然是“地院成立革委会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那么，地院革委会又是怎样研究、部署这“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的呢？这和洪涛一伙有什么联系呢？笔者还有一个疑问，杨雨忠又是听谁指挥的呢？不会是听洪涛指挥的吧？

3. 至于“并没有发生武斗”——那么，“狠狠地痛击了一小撮保皇党的猖狂挑衅”（4月11日《东方红报》语）是什么呢？王大宾自己写的“严重对抗肢体冲突”又是什么呢？

4. 关于“多少年后，聂元梓曾说：北京高校群众组织分成天派、地派，天

派的后台是江青，地派的后台是王关戚。（详见参考文献 5）”“参考文献 5”就是《王大宾回忆录》，笔者查阅了该书，没有找到相关的文字。请“大事记”的编者提供具体的出处。

聂元梓说“天派的后台是江青”？聂元梓还没有愚蠢到这样的地步吧？

还有些人用“孙蓬一自诩是江青派”大做文章，那么，孙蓬一的原话是怎样说的呢？

1967年4月11日，六个学校的广播车来北大寻衅，地院的一个人竟然说：“毛主席给你们新北大题字有什么了不起？”当我校同学追问他时，他大骂：“你们不要狗仗人势！”另一个家伙还叫嚷：“聂元梓怎么当上红代会组长的呢？要揪出她的后台！”¹甚至说：“你们是江青派”。在4月13日晚的大会上，孙蓬一说：“有人说我们是江青派，我们就是江青派，江青派就是毛主席派！”由此可见，“你们是江青派”的发明权不是孙蓬一，而是地质学院的人。当年笔者在现场听到孙蓬一讲此话，还有满脑子疑问：地院的学生怎么能如此大胆？看了王大宾的回忆录后，才知道地院“东方红”连江青亲自管的沙家浜剧组也敢砸，剧组的人也敢绑架，确实是天不怕地不怕，地院学生说那些话也就不奇怪了。

结束语

“民族宫事件”发生后，双方都发表了抗议声明。直接参与这次事件的单位并不多，但在声明上签字的单位却都有几十个。这种情况早在新北大公社成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北大一些学生已经从中看出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

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很清楚，地院东方红只不过是当了别人的工具而已，但这起事件显示了新的动向。正如孙蓬一1967年4月12日讲话所说：“所谓的民族宫事件本来是微不足道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目的是他们背后的那些人要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政治阴谋！”

新北大公社并不了解民族宫在关锋、吴传启团伙中的重要地位和敏感性。数十年后，笔者才知道，民族宫是康生手下“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的驻地，而关锋、吴传启、林聿时都是这个编写组的核心组成员，民族宫是这伙人的重要活动据点。“一月夺权”时，吴传启、林聿时和谭厚兰等密谋上书中央文革建议戚本

¹ 参见《一个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载《新北大》1967中年4月13日。

禹出掌北京市大权，开会的地方就是民族宫。因此，尽管批判“民族工作展览”并不涉及洪涛、刘郢本人，但是，洪、刘和他们的后台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千方百计进行阻扰、破坏，终于在4月8日挑起了一场震惊全市的武斗。关锋、王力垮台后，洪涛也被逮捕。新北大公社曾获得机会审问洪涛，洪涛供认，那天他就在武斗现场指挥。

地院东方红被人利用了，自己还不知道。“4.8事件”的结果，直接推动了聂、孙举报关锋、吴传启团伙，坏了这个团伙的大事；而“4.11事件”的结果，又推动了孙蓬一的4.12讲话，公开揭露了这个团伙。偶然事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吴传启们的好日子由此终结。

1967年4月16日，地质学院革委会和东方红公社发表《关于目前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声明》。《声明》说：“孙蓬一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揪出来由全市广大革命造反派揭发、批判、斗争。并揪出孙蓬一讲话的幕后策划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这股反革命黑风。”

为什么这样痛恨孙蓬一呢？就是因为孙蓬一的4.12讲话公开揭露了吴传启、洪涛这个阴谋团伙，而阴谋家们一旦被公开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完蛋了。至于“揪出孙蓬一讲话的幕后策划者”的叫嚷，这是被蒙骗者的口号，而在蒙骗者心里，是清清楚楚的。他们心虚了，害怕了，于是，继卢正义之后，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这几个红极一时的“响当当”的“左派”，也离开北京躲藏到外地去了。这是谁下的命令，至今仍是一个谜。

有趣的是，北师大井冈山这次置身事外，不知道是接受了教育部夺权的教训，还是得到了某人的指点，他们于4月13日发表声明：“关于四月十一日、十二日新北大公社和地质东方红等革命组织之间所发生的严重冲突，我师大井冈山根本没有参与。”该声明刊于《井冈山》第29期，笔者当年没有看到。北师大井冈山受人利用，为保卢正义而同北大发生冲突，关锋、王力用谣言打压北大，没想到暴露了自己，卢正义也不得不外出逃亡。这个结果，是谭厚兰想不到的。

拜地院东方红所赐，“4.8事件”和“4.11事件”之后，该着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逃亡了。而按照关锋、王力等人原先的如意算盘，吴、林二人本来是要进入中央文革下面的某个机构大显身手的。这个结果，也是“4.8事件”和“4.11事件”的指挥者们绝对想不到的。

这曾经是一股谁也惹不起的势力。北大和北师大为卢正义的问题发生矛盾时，清华“井冈山”宣布退出；在“批展”引发矛盾时，“北航红旗”宣布中立。他们都清楚，那是真惹不起啊。新北大公社“乱打乱撞”地参加“批展”，扰动了一只蝴蝶，竟然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

【资料】

重庆“八一五”战歌词曲

《“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是重庆“八一五”派的战歌，此歌的词曲谱是中央音乐学院赴川战斗队创作的，歌词分两段：

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可挨打，可挨斗，决不低下革命的头。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决不丢。

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敢革命，敢造反，革命到底不回头。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打黑帮，破四旧，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

1=G $\frac{2}{4}$ 中央音乐学院
赴川战斗队创作

$\underline{\dot{1} \cdot \dot{1}}$ $\dot{1}$ $\underline{\dot{5} \cdot \dot{5}}$ 5 $\underline{\dot{1} \cdot \dot{1}}$ $\dot{3}$ $\dot{5}$ — $\underline{\dot{6} \cdot \dot{6}}$ $\dot{6}$ $\underline{\dot{5} \cdot \dot{6}}$ $\dot{3}$
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 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
$\underline{\dot{1} \cdot \dot{2}}$ $\dot{3}$ $\dot{5}$ $\dot{2}$ $\underline{\dot{6} \dot{1}}$ $\dot{2}$ — $\underline{\dot{1} \cdot \dot{1}}$ $\dot{1}$ $\underline{\dot{5} \cdot \dot{5}}$ 5 $\underline{\dot{1} \dot{5}}$ $\underline{\dot{1} \dot{2}}$
决不低下革命的头。 革命到底不回头。
$\dot{3}$ — $\underline{\dot{2} \dot{2} \dot{2} \dot{3}}$ $\underline{\dot{5} \cdot \dot{5}}$ $\dot{5}$ $\underline{\dot{6} \dot{6} \dot{5} \dot{3}}$ $\dot{2} \dot{5}$ $\dot{3} \dot{2}$ $\dot{1}$ —
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决不丢！ 斗，打黑帮，破四旧，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此战歌的歌词、曲谱由周孜仁提供，谨此致谢）

【百年中国】

画说我的一生 (16)

刘海鸥

上战场，枪一响……（上）

（1967年8月-10月）



1967年7月份全国的武斗已经发展为全面内战。

有消息说新疆那边闹得更凶，我心里又活泛起来。新疆非常吸引我，一是因为那里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前两个月在云贵川虽说有武斗，但是没有真正看到武斗的场面，没有真正经历过“腥风血雨”的“考验”。二是那里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他们不同于其他的少数民族，饶有异族风味，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对新疆感到既神秘又浪漫。最重要的是姐姐海燕在那里，我已经有几年没见到她了，我要去看看她。

我去找外地上访人员搞火车票。上京告状的人现在多住在北京大专院校第三司令部的大本营地质学院。我在找到了新疆人的住处，他们都是新疆造反派红二

司的。听说我要去新疆支持支持红二司（其实我根本不了解红二司是什么观点）。他们当然十分感激，票很顺利地就弄到手了。在地院我还认识了两个机械学院的学生，也在搞票子，我们决定一起去新疆。



克阳听说我要去新疆，也要去。那时我们关系有些紧张，因为她在中学生的“四三”派里搞得很热闹，我觉得“四三”派过激，常常和她发生争执。这次她主动找到我，我也就替她弄了一张票。

我装好了绿帆布挎包，每次串连它都跟随着我。里面有一两件衣服，和一些假证件。我搞到了一个假学生证，还有一些盖了章的空白介绍信、毛主席语录、扑克牌和串连地图临走时发现挎包不见了，到处找不到，原来是妈妈藏起来了，她担心我的安危，坚决不让我去。我气得不得了，跟她大吵大闹，她就是不把书包还给我。



没想到第二天爸爸把挎包拿来悄悄交给我，说他是从妈妈那里偷来的。他说：“你们去吧，小心点，见到海燕把她带回来。”爸爸为什么支持我去新疆？就是为了海燕！全家人都在为她的没心没肺拼命三郎的性格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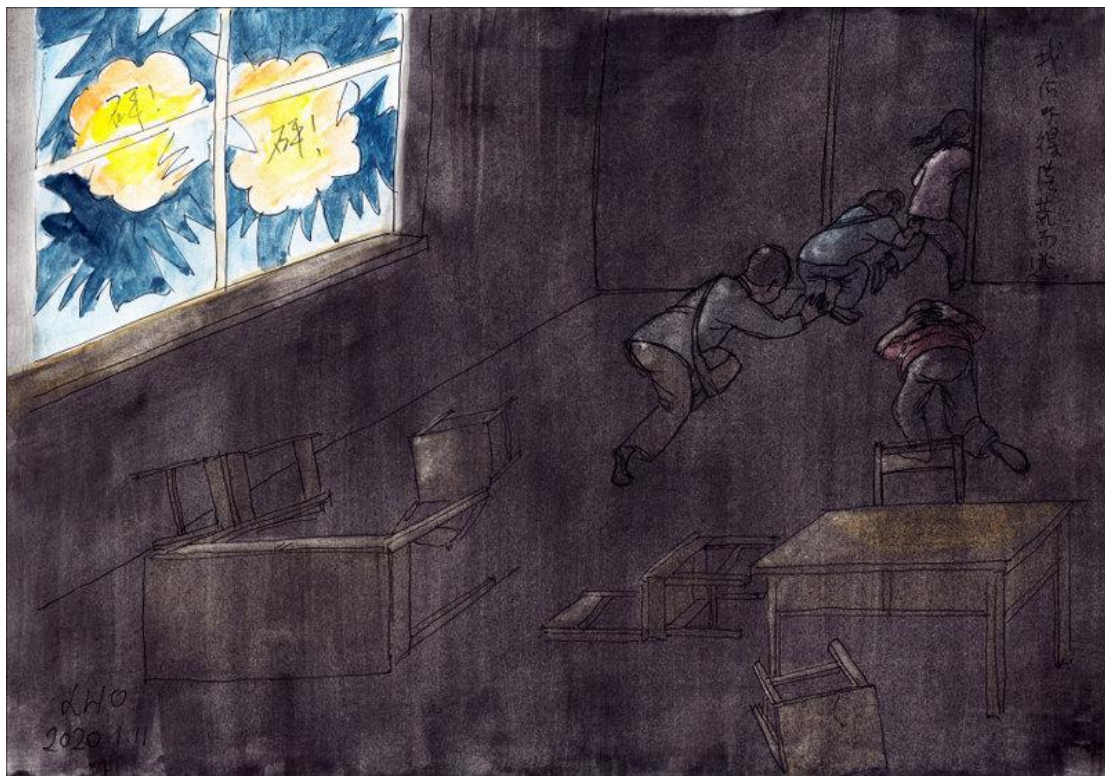


八月中旬，我、克阳，还有机械学院的两个学生一行四人出发了。火车到乌鲁木齐需要开五天四夜。第四天的黄昏时分火车到了兰州，说前面夜间常有武装袭击，火车停开了，我们只好下了火车。

兰州也已经变成了壁垒森严的战场，整个城市呈现着好像被“三光”（日本侵华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以后的景象。晚上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所学校进去休息。学校里没有一个人，所有的教室门大敞，里面桌椅翻倒。灯泡玻璃几乎都打碎了，墙上弹迹累累，焦痕斑斑，看来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战斗。

我们在二楼找到一间有电灯的教室，把桌椅拼凑了一下，四个人为打发无聊时光玩起扑克牌，准备就这么打一夜。我们玩的是当时最流行的“四十分进贡”，我不会打，乱出牌，总是输，向对方“进贡”。把我的“对家”脸都气白了。

深夜，我们还在打扑克，只听见外面炮声隆隆，一声接一声，发炮的地方不算太远，闪着红光，炮弹是朝我们这个方向打来的，震得玻璃哗哗响，楼板也在颤动。我跑到窗口张望，炮火是从对面的一个建筑物发射出来的，目标正对我们这一间亮着灯的教室。我们马上明白了，这个学校已被势力强大的一派控制着，他们赶跑了另一派，今晚见学校里又有灯光和动静，一定是以为另一派又跑回来在搞阴谋复辟活动，所以炮火猛击。





我们知道此地绝不可以再停留，立即关上灯，猫腰溜出教室。

穿过空旷的学校的空场，只嫌院子太大，我们飞快地往火车站跑去。



我们在火车站台转了一圈（经常扒火车，可以毫不费力地就钻进火车站台里），看见一辆挂着开往乌鲁木齐牌子的火车黑灯瞎火地停在那里，就摸了上去，

车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睡觉，我们各自找了一个长椅躺下。

不知是几点钟，反正是漆黑的深夜，突然间一阵粗暴的吆喝声把我惊醒：“都是干什么的，不许动，谁动就捅了谁！”睁开眼，明晃晃的手电光在脸上晃动，照得眼睛睁不开。借着忽闪忽闪的手电光见一群粗大的汉子，面目狰狞，头戴钢盔，手端长矛。长矛和电筒一起在眼前比划着。平生头一次经历这种阵势，不知这些人什么来头，我感到巨大的危险包围了我们，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克阳也吓得哆哆嗦嗦。实际上车厢里的人都吓呆了，除了那群汉子的吆喝声，没有任何声音。持长矛戴帽盔的人继续吆喝：“起来！起来！都带走！”我听说过，被那些杀红了眼的人抓走，是连命也保不住的，难道真是要未曾出师先折戟？



正在上牙磕下牙地打颤，只听见有一个镇定的声音：“大家谁也不要走，谁也不要动。”那些武装汉子的头头被声音牵过去：“你们是干什么的？”那镇定的声音道：“我们是首都红卫兵司令部三司联络站的记者，我们去新疆调查武斗事件向中央汇报。”汉子问：“你们支持哪一派？”“我们支持新疆革命造反派红二司。”

事情一下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为首的那个头头说：“我们是甘肃的造反派组织，我们和新疆红二司的观点是一致的，咱们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说罢

握手言和，下车之前表示还要替我们站岗放哨，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

不知不觉地，人们都已经循着那个镇定的声音围了过去，似乎找到了主心骨。我和克阳也挤到那个人的身边。

那个人的镇静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知道跟着他这样的人一起是没错的。第二天弄清了这帮人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都是一二年级的。夜间镇定退兵的是他们的老师，姓高，是那帮学生的领头。我们和这帮人一同上了去乌市的火车。

火车过了嘉峪关，嘉峪关以后是满目荒凉的景色，没有绿树草地，只有黄土地、黄土山、黄土建造的村落以及漫无人迹的戈壁滩。人说一过嘉峪关，两眼泪涟涟，海燕当时进疆时大概就是这样的心情吧，我记得她在信中谈过的。



到乌市已是黄昏时。一大帮人大概五六十人，其中有科大的十多个，我们四人，还有一些到新疆串联的散兵游勇，更多的是新疆红二司上京告状返回的人，一下火车就到自治区革委会静坐示威，提了什么要求，大概是给红二司平反之类。那天是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一周年纪念，街上的大喇叭喊得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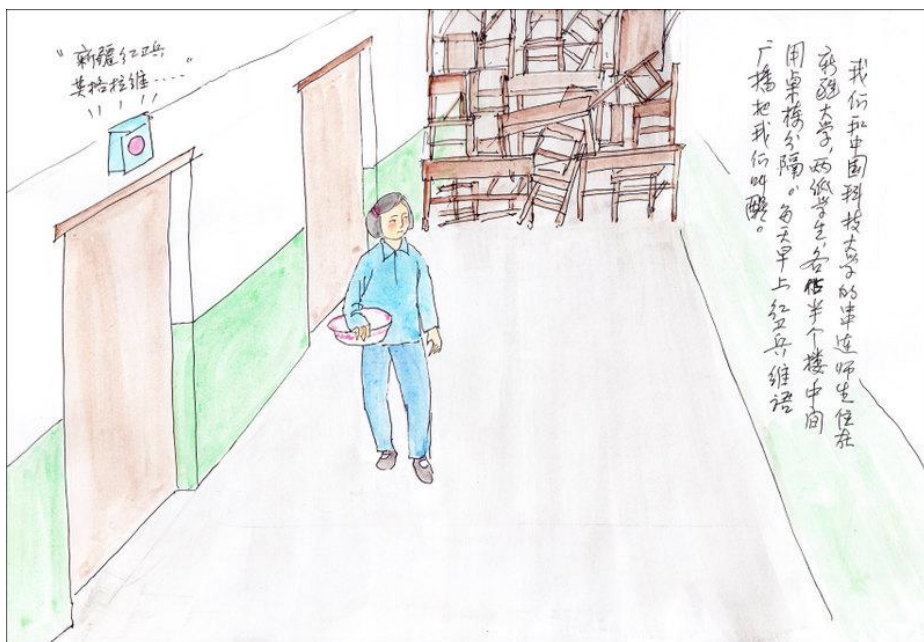
新疆的两派是以打倒还是保护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兵团第一政委王恩茂来划分的。当时的形势是新疆的“老保”——“三促会”占着上风。人数多声势大，有军区支持，而且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是保王的。

我们一行人坐在自治区委大院的台阶上，久久不见人出来，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大家索性就在院里过夜等待明天早晨。新疆的天气是“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8月的新疆夜里极冷，我们坐在大院的台阶上，抱着自己的膝盖尽量减少散热面积。刚开始大家唱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一支又一支。



最后还是冷得受不了了，就两人一伍排成长队在大院里跑起圈来，嘴里高喊“打倒王恩茂！”“支持红二司！”一类的口号。就这么折腾了一夜，很是热闹。

第二天等军管会的人来上班，有人和他们交涉，大概是达成了一些协议，我们撤离了自治区委大院。



我们和科大的师生入驻新疆大学。新疆大学算是红二司的大本营，红二司在新疆早已失势，学校基本处于人去楼空的状态。桌子和椅子堆砌在教学楼或宿舍楼楼道的中段，把楼分成两个部分，那也已经是两派斗争的遗迹。学校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人坚守，每天早上学校的高音大喇叭就传出维语广播：“醒疆哄维兵英格拉维（新疆红卫兵广播）……”

不久新疆大学的造反派失守，我们搬到了外贸局。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是“老保”占优势，“造反派”多是乌合之众，打倒一切不得人心。造反派的失势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新疆的造反派也是一派失败主义情绪，躲躲藏藏。



科大的学生十分听从高老师的指挥，他们经常开会，分析形势，制定方针和任务，我和克阳也被邀请参加，可是开会我是插不上嘴的。我的不自信是一贯存在的，觉得谁说的都对，也怕一开口就露出自己的无知。结果倒给人留下了深沉、傲慢或事不关己的印象。如今在外面我有了充分的主宰自己的权利，但是能动性还是发挥不出来，我常常为自己的“糊涂”而苦恼和自责。现在想起来，除了有一腔革命热血，自己干的什么并不明确，简直是稀里糊涂，那时怎么会想到文革整个就是一场愚民运动呢，糊涂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特别愿意做一些事务工作，收集情报，刻蜡版，印传单。他们还给我搞了一个“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住新疆记者”的证件，虽然就是薄薄的小纸片一张，但有三司的大印，非常有权威。

一天碰到高老师，他与我打招呼，称我老刘。我问他为什么叫我老刘。他说：“你工作认真，我很敬重你，故称老刘。”高老师二十七八岁，出身老八路家庭，陕西人，他说他八岁时就和父亲上战场，父亲们在前面打仗，他们小孩子趴在后面观战。他是一个很有魄力和智慧的人，能上科大然后又能留校的人必不简单，当然还必须是党员。学生们都很听他的，也爱和他开玩笑。他长得很奇怪：眼睛又黑又圆，鼻梁高高的，是鹰钩鼻（那个鹰钩鼻子让我怀疑他有匈奴人的血统），嘴不大，下巴尖尖。这副搭配似乎应该构成一个英俊的面孔，可是在他那里很可笑，像一只鸟。我和克阳私下里称他为“高鸟”。



一天我和高老师一起去采访乌市红二司的造反派头目姜安安，一个女孩子，夺了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大权，在乌市大名鼎鼎，人人提起来都知道她的名字。我们去了广播电台找她，因为拿着首都三司的记者证，很容易进入。在电台里拐了好几个弯，才到了姜安安藏身之地。

这位名人对首都来的造反派非常热情，和我们谈形势谈任务，当然，都是高老师在谈，我只是对这个威名四扬的造反派女头目好奇才跟着来的。姜安安就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长相很一般，可冲劲十足，说话声音沙哑，像个男孩子，很有魄力，这又让我很自惭形秽。❏

【书讯】

内蒙兵团·知青生活·长篇小说 沈言真著《青春无歌》在美出版



ISBN: 978-1-68560-002-0 (Print)

978-1-68560-003-7 (Ebook)

书名: 青春无歌 The Youth without a Song

作者: 沈言真 Shen Yanzhen

出版: 美国华忆出版社

字数: 215 千字

售价: 25 美元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LCCN: 2021 919 526

内容简介

这部小说描述了1969至1979的十年间，一群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在毁情灭欲的社会环境中的艰难挣扎。副指导员郑绩东与郝海静暗暗相恋，郝海静出身不好，上大学被淘汰，她迁怒于郑绩东，与郑断了联系。而郑则受“黄帅事件”的牵连，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沦为劳改对象。古岗南因“四五”天安门事

件差一点被开除军籍，无奈之下接受了无爱的婚姻。刘玉芳、王霖、小米粒等人在连队里也都有各自暗恋的对象，但因为军纪的禁锢，他们的爱情之花大多凋零。在那个思想被压抑，人性被扭曲的岁月里，爱情之花被摧残，青春的声带被割裂。是为《青春无歌》。❏

作者自白

当笔下人物有血有肉时，感情来了，常常含泪辍笔，变身成为了读者，为我们一代知青痛惜。随着情节的深入发展，下笔沉重了。作者似乎享有充分想象和恣肆虚构的自由，然而艺术上的创念还是要有边际的，本质的真实是必须的。因而，渐渐变成不是我纵笔，而是手中的笔循着历史的脚印，亦步亦趋。它不可走形，不由我自由落笔，不由我任意褒贬。❏

战友评论

《青春之歌》那个时代渐行渐远，杨沫和那一代人的初心已变得模糊不清。但言真的《青春无歌》却鲜活地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之中。那种无歌的回忆常常使人心痛，使人不忍直视却刻骨铭心。这本书用那割断了爱情声带的“无歌”岁月，催人自新，发人深省：为什么我们父辈献身的壮丽事业竟变成这般模样？为什么生长在红旗下的我们，会迷恋于践踏人权的理想，扼杀个性的体制，而甘愿将青春年华，以至生命献祭给那场革命？

但愿这本书能唤醒后人，但愿今后的青春都充满歌声！❏

【序跋】

《青春无歌》序言

隐秘之恋：“无歌”时期的爱情

雷霆

《青春无歌》从初稿到最后成书，期间有十数年的搁置。作品搁置不是因为作者的放弃，而是因为作者严谨守业的态度和主动沉淀的自觉。本人和作者沈言真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同团同连的知青战友，小说的初稿我也在第一时间读

过。那时整个社会对知青运动的反思还远没有到达现在的深度和广度。但是言真的笔触已经有了超前的抵达，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突破了主旋律的是非道德标准，更接近知青生活的真实境况和知青内心的真情实感。对人性的描述也更加立体多元。

十数年之后，从改革开放中走过来的知青一代，并未肩负起社会赋予的革新角色，在对历史反思中觉醒起来的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包括社会顶层反而陷入回潮倒退之中，虚无的国家历史和真实的民间记忆激烈冲突，社会思想分裂加剧。此时，作者再次进入创作激情，历经数月的修改，《青春无歌》终于以更充实更生动也更接近知青生活底色和时代烙印的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为知青文学创作再添一抹亮色。

小说中贯穿始终的是一对知青情侣的爱情故事。在沉重艰苦的农事劳动和压抑的政治氛围下，在把爱情归于资产阶级情调的舆论教育以及兵团明令禁止谈恋爱的禁锢中，年轻的心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被迫转入地下。作者不惜笔墨淋漓尽致地描写了知青的爱情，令读者分享其中的甜蜜与苦涩，痛心其艰难与扭曲……

沉着稳重的知青副指导员郑绩东和单纯美丽的女战士郝海静在远离家乡的内蒙古荒原上互相吸引偷偷相爱，环境不允许这种爱情的存在，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一对隐形恋人。这对情侣暗中的关切，内心的思念，抑制不住几乎外溢的情爱，分手后的痛苦与思念，误解中的悔恨与折磨，历经波折后的重逢……作者把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物真实的心理体验描述得细致精准，令人动容。女性作者特有的细腻和深情往往化为传神之笔，将读者带进那神奇美妙的“可可托之海”之中，与主人公悲欢与共。

当郝海静被选调到师部篮球队，恋人面临离别时，他们的情感有了一次升华，作者写道：

这半天来，胸中郁积的愁闷霎时按捺不住，郑绩东不由得握住她冰凉的手，她的手指长细长，他抚摸着它，温暖着它。他高大强健，眼前的这个美丽富有活力的女孩儿是他最渴望保护的，他爱她，今天他刚刚领会到，深爱她！猛然，他举起她的手送到自己唇边，吻它。

“我不去，我不去。”郝海静喃喃地说，骤然离别让她不能接受，看到郑绩东这样动感情她更百感交集，向下望，只能看见他头顶上浓黑短直的头发和低垂

的脖颈，她脑子一片空白。

从进屋见到他的那一刻，她就作出决定了，她不愿远离他。只有这个想法，来不及考虑别的，甚至郑绩东会怎么想，她也并没有顾及。

郑绩东明白，她不是来安慰他，也不是在作出牺牲，目前，她脑子里根本没有那些意识，就是简单的舍不得。这就够了，恰恰这样，极大地安慰了他，她像透明的水滴，她的爱清澈自然，洗褪他的烦忧。她丝毫没有考虑自己，那么，谁应当替她作打算呢？

爱情本该是纯净的。在知青生存艰难境遇下，这种爱情就更显宝贵，作者的描述更让人为情所动。爱情滋润着苦难中年轻的心。

有人说那个时代的主题不是爱情，是的，那是于一场浩劫之中，是人人自危，生存艰难的时代，整整一代人人生的命运都因此不可逃脱地带上了悲剧色彩。但是，爱情却不会因此灭绝。尤其在兵团这个姑娘小伙汇聚的群体中，尽管上级采取了极端反人性的严防死守，爱照样出现并以特殊的形式发展。我是个比较保守的女知青，也在夜晚的灌渠旁，偷偷约会过本连的男生。我利用职务之便，暗中为男女知青传信搭线，竟也促成了三对鸳鸯。所以当我读着书中的爱情故事时，既有感同身受，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然，书中的爱情故事是具化在兵团生活之中的，作为当年的兵团知青，作者对亲身经历的事件和场景非常熟悉，信手拈来，写得自然而流畅。特别是因为每个事件、场景、人物都有原型，而作者又以尊重事实、尊重人性的准则从事写作，直抵最真实的原生态，使数十年前发生的故事跃然纸上，重现于读者面前。

曾记得：那次打场，那次堵渠口，那次食物中毒，那次连队大搜书；那个绝食女生，那个落井而死的小童，那个放荡不羁的干部子弟，那个因饥饿难耐去偷拿猪食马料的夜晚，那个母猪屋内大造反的午后，那个吊在蚊帐上的浸满敌敌畏的布条；那种围剿野兔的快乐，那种不能上大学的绝望，那种被罚站在蚊虫叮咬中的忍耐和愤怒……呵，一切都历历在目鲜活如昨，作者用她那携风带雨般的文字把我们推回到当年的岁月，推回到内蒙古兵团知青的青春时光。

是的，那么熟悉的荒凉野蛮严酷的生态环境，那么熟悉的忍饥耐饿挥汗苦干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劳动场面，那么熟悉的亢奋扭曲失望无奈痛苦渴望逃离的心路

历程。然而和我们个人感受不同的是，作者呈现给读者的视角是新颖多样的：脱粒机上那个被老鼠钻进裤子的女孩在惨叫，黑夜掩盖了女孩的身影，读者随着作者仰视的镜头睁大眼睛去寻找。当汹涌的渠水把知青们冲走裹入泥水中时，作者的镜头是航拍式的，读者看到的是全军覆灭的全景，而对下井救人的事件，作者的镜头是平视的，这些场景、视域，令读者耳目一新。

而作者对知青内心的探究和揭示也显出功力。十六岁的女孩刘玉芳被招兵的解放军忽悠到荒蛮之地后，竟以五天的绝食抗争要求回家。当然她未能成功。书中写道：

大约从那天开始，刘玉芳进食了。绝食无果而终，应了大家的预言。

多年后她曾与最信任的人提起进食的事，淡淡地说：“如果再不吃，就死了。”

16岁女孩的心思，多么凄然！

她会饿死吗？连里领导和团里领导会任凭她被饿死吗，会的！即使送医院抢救不过来，也不会从她愿的。因为关系到军心动摇的问题，假若她成功获准返回北京，绝食立即蔚然成风，局面将不可控制。

人是奇怪的动物，大部分人都后悔、都想逃离，而刘玉芳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甚至有可能为大家踩出一条路，但是几乎没人同情她，没有任何人伸出援手。反而各种议论层出不穷（尤其女生），当然还有积极分子的革命义愤。

这一段言简意赅的文字写到了人性的痛点，读之心里也有痛苦掠过。

凡此种种，不但使小说的格局突破了知青个人经历的局限，而且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通过这些真实画面，作者为兵团生活的亲历者提供了重新审视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的机会；为不了解兵团生活的读者展示了革命的非人性——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成为强力灌输的“正能量”的时候，“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就会成为社会常态。

小说对知青生活的描述，是把知青放在社会人的位置上来定位的，年少失学发配边陲“接受再教育”，这是兵团知青的共同属性。班排连的组织呈网格状把知青管束起来，但是年轻的心谁不向往自由，谁不向往未来。书中对全连大搜书的描述令人心惊肉跳。而当年的我们，除了想方设法藏书和忍痛交出书本之外，还有貌似做错了事的心虚。如今重新面对此情此景，心里的怒火直冲上来，这不

仅是对求知欲的可怕扼杀，更是对文化明目张胆地屠戮！作者冷静从容、不露形色地把这种反文化反人性的时代特色娓娓道来，使作品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更可贵的是，作者写兵团知青，却不被兵团所限。小说的时空从内蒙古扩展到知青的出发地和归属地——北京。知青的故事离不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离不开父母乡亲左邻右舍。这不仅是亲情乡情的连接，也是“再教育”之翅膀扇动的必然波及。小说透过郗海静、古岗南的眼睛，把“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完整生动地展现出来。知青们关注甚至参与了这场人民自发的抗争，那些抄满广场诗词的小本子知青中传阅，知青受到的启蒙不言而喻。

内蒙古兵团与北京之间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黄帅—王亚卓事件，北京中关村小学的学生黄帅要打破师道尊严，写信告了老师一状。告状信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内蒙古兵团知青王亚卓写信对黄帅之信提出异议，不料捅了马蜂窝，异议者被公开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件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除了当事人的纪实文学，在长篇小说中被记录和再现，本书应是首创。郑绩东因为参与其中受到牵连被免职并强制劳动，在此期间他表现出坚强的性格和自主的思考，这一情节是作者颇具匠心的安排。使郑绩东的人格更加完善，也使郗海静对他始终不渝的爱有了令人信服的理由。知青思想的成熟和人格的升华在此可见一端。

作者是在北京中关村地区长大的，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印在她的心里，科学院的各个院所，八大学院每个校门，甚至莫斯科餐厅里的菜肴都是她闭着眼就能想出来的。所以她的笔下，对当时知识分子境遇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真正的知识分子被打倒，没有知识知识青年下乡被农民再教育，这是多么荒谬的令历史蒙羞的倒行逆施，但是它真实地发生在神州大地上，也被作者以清晰的有血有肉有细节的笔墨记录到她的作品里。

小说的结尾，作者给予了一个温暖的落幕，温暖在此是希望之光的折射——终于恢复了高考，那对情侣分别考上了大学。他们的爱情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到阳光之下。一切恢复到了来之不易的常态。但是变态是否会卷土重来？“红轮”是否会倒转？小说的余味中弥漫着的忧虑，似乎在等着历史的回答。

1958年杨沫出版了风靡于世的小说《青春之歌》，她赞颂革命的青春，呼唤青年跟着党向旧世界宣战，1957年的反右运动为这一代青年的归宿做了注脚。

五十多年后，言真把同样讲述青春故事的小说命名为《青春无歌》，为否定文革、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提供了事实依据。

《青春之歌》那个时代渐行渐远，杨沫和那一代人的初心已变得模糊不清。但言真的《青春无歌》却鲜活地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之中。那种无歌的回忆常常使人心痛，使人不忍直视却刻骨铭心。这本书用那割断了爱情声带的“无歌”岁月，催人自新，发人深省：我们为什么会从一个文化多元、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旧中国，走向一个思想一统、文化专制、禁言禁欲的新时代？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青年，为什么会狂热、偏执、愚昧，而迷恋于践踏人道的理想，扼杀个性的集体主义，甘愿将青春年华，以至宝贵的生命献祭给那场虚幻的革命？

但愿这本书能唤醒后人，但愿今后的青春都充满歌声！

2021-9-21

【序跋】

从“无歌”到禁声

——《青春无歌》后记

沈言真

本书于2006年动笔。那时悠闲，心中平静，坐在大阳台上望着远处铁塔上的鹰盘旋，旁边茶几上放着纸笔，可以随时记下突来的灵感。……更多时候坐在那里发愣，任思绪飘游，无拘无束，不疾不徐。历经三年，人物、故事情节就这样逐渐显现。

当笔下人物有血有肉时，感情来了，常常含泪辍笔，变身成为了读者，为我们一代知青痛惜。随着情节的深入发展，下笔沉重了。作者似乎享有充分想象和恣肆虚构的自由，然而艺术上的创念还是要有边际的，本质的真实是必须的。因而，渐渐变成不是我纵笔，而是手中的笔循着历史的脚印，亦步亦趋。它不由走形，不由我自由落笔，不由我任意褒贬。

心已经不静，回望过去路，经历的那些风雨清晰再现，裹挟着我们青春走过的那个时代扑面而来，警醒着我要记下它，谨防欺骗重来。

2009年，书写完了，却发现不能出版，试探努力了两次，毫无可能。三个

春秋的心血只能束之高阁。无所谓，因为经受了“回眸”这一过程，不虚此行。况且，即使她养在深闺人不识，也照样是我的小儿女，怡我悦我。

环境愈来愈风霜刀剑严相逼，偏在此时，偶然得知，有志士创“胡志明小道”，帮助那些被钳口禁声者，不少人经此小道出书，得以发出微弱的声音。古井般的心重新激起涟漪，要让我的小儿女见天日，她不但是作者人生的一段亲历，而且是一代青年的生活思想缩影。寻出电脑角落深埋十几年的文稿，即便她在艺术上幼稚，构思不够严谨，语言不够老练，也毕竟揭开了社会生活的一页。

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会面临“质本洁来还洁去”的那一天，知青一代即将离去，唯有留下真诚真实，才对得起自己。

“还洁去”之前，交出这朵野生雏菊，让它经阳光沐雨露，任世人评说。☞

2021年9月13日

【序跋】

实录与诤言

——《一路走来》序言

张宝林

—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是文革中期，一批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毕业生，陆续被分配到安徽淮河边的一个叫凤台的县城工作。其中有68年毕业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张树田兄，和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我。还有来自清华的文小凡、朱根五、周振国，北大的蔡泽钦、许巍，复旦的叶松涛、潘小龙，南工的唐嘉陵、朱广佳，科大的梅慰坤，北农大的何美德，北邮的张翼程、张敦英等。我们这些人后来戏称是“凤台老九”。由于都是外地人，经历相似，趣味相投，所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加上当时大多单身，星期天无处可去，就常常聚在一起，打打扑克，下下象棋，喝点小酒，自然成了密友。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人有的调回了各自家乡，有的考取了研究生，大多离开了凤台。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在凤台扎了根，树田兄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他当了县官，其间曾调到淮南市一个区当区长。后来又回到凤台，当

人大常委会主任，直到退休。他常开玩笑说，你们是飞鸽牌，我是永久牌。你们是奔驰，我是沃尔沃（卧而卧）。

这几年，“凤台老九”除了早逝的一两位，在北京、凤台聚会两次。第二次聚会时，树田兄悄悄对我说，正在写自己的经历，还没写完。希望写完我给写个序。他说，学工科的，写东西不行，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也有人劝他别写，写出来得罪人。但他说，人来世上几十年，怎么走过来的，回忆一下挺有意思。好在一路走来，还真干了一些事儿。他知道，现在这书不可能正式出版，那就找个地方印几百本，留给子孙后代和一些熟悉的朋友，也算是个念想。

前些日子，树田兄把电子版寄来了，书名就叫《一路走来》（下面简称《一路》）。我认认真真读了一遍，觉得这个序，我是推托不掉了，必须写，还得认真写，马虎不得，否则对不起他对我的信任，对不起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对不起这部书稿。

我原来以为，他这本书，可能就是扩大了履历表。他在县里工作的时间很长，可能是重点，但小小的凤台，有多少可写的东西呢？我在县里工作过六年，我觉得值得一写的东西实在有限。

但他的书稿，334页，充实饱满，激情四射，反思深深。读后为之一震，也使我对这位老兄充满敬意。说实话，虽说原来在一个县城好几年，但毕竟各有各的工作，相互了解并不太多。这次看书稿，才对他的一生，包括他的童年、学生时代、文革中的大学生活、在凤台的那段经历，尤其是我离开凤台以后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知。

《一路》从出生（1943年10月）写起，一直写到2018年，他曾经为之呕心沥血的“西淝河排灌站”竣工，横跨75年。这75年，有整整6年在新中国成立前，也就是民国时期。此后便是所谓的“解放后”。现在人们常说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他当然全部亲历。

所谓“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并不是确指。“前三十年”应该指1949年到1976年或1978年，即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或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人们现在习惯后一种说法，即前后以1978年分界。此后到去年，又是十年。所以，《一路》是从个体视角，从民间这个侧面，映射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全部历程。

“新中国”有官修的历史。自1949年始，每十年都会有各行各业总结自己的十年成就，还会有一本由权威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XX年》大部头问世。195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撰文，题目就叫“伟大的十年”。那年出版的书名，我还记得，是由周总理金字题名、红色封面的《新中国十年》。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书中介绍：“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准绳，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忠实、客观地记载在这不平凡的五十年中，我们党、国家、人民前进的足迹。”

历史上由官方主修的历史，叫做正史，但每个朝代，一般都不修本朝史，而是修前朝史。新中国当然也不可能自己修当朝史。但是，像上面说的“官史”还是每时每刻都在“修”着的。

除了正史，还有一种野史。古代有一种小官，叫作稗官，专给帝王搜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供皇上御览，了解民意民情。稗官写的这些文字叫做野史，后来，非官方私人编撰的史书也叫野史。

民间学者、文人骚客，甚至普通人撰写的诗词、杂录、族谱家谱、私人记忆，实际也是野史的一部分。唐代的伟大诗人杜甫和白居易的许多诗篇，忠实记录了所在时代的民间疾苦和社会百态，被称为诗史。而小说家言，如《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都可以作为了解历史的佐证。

从古至今，官方对民间的撰述和收藏少有支持甚或敌视。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种情形历朝历代，绵延不绝。历史学者吴迪说：“自秦以降，民间修史屡踏屡起，至明后期，官禁不在，野史大兴。有清一代虽文网森严，但也未能将民间修史斩净杀绝。毛泽东时代空前绝后，以思想一统，管理一元，将民间著述扼杀在摇篮之中。只有到了改开时代，才有了民间著述的空隙。当局尽管百计千方，严防死守，用维稳手段对付学术，以‘预防式管控’封杀社会记忆，但是，回忆既往，怀念故人，讲述痛史的滚滚大潮仍旧决堤而出。”

《一路》就是当代史的个人记忆。冠冕堂皇的官修历史，虽然自称“忠实、客观”，实际常有文过饰非甚至歪曲、伪造之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只有允许大量的民间叙述存在，才能把真正的历史留给后人。

当然，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由于史家的立场、见识、文笔的良莠不齐，

都有优劣之分。修史，讲究的主要是史德。有史德才能写好史书。古人把修史的要素用六个字概括：“史事、史文、史义”。史事，指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必须真实可靠，不能虚构，不能扭曲，更不能为了特定目的胡编乱造。史文，指记载史事的文献和表达的文笔，人们自然希望文献多，文笔好，俾可供人爬疏辨识，喜闻乐见，流传久远。史义，是指具有史家的志向和观点。这个“义”字最难做到。清代的大史学家章学诚对这六个字的解释是：“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

作为工科生的树田兄，未必读过章学诚等人的著作。但他的这本《一路》，却暗合了史学界关于修史的要义。

二

首先，树田兄忠于“史事”。他把自己从童年到晚岁的经历，如实记录在案，不虚不妄，客观实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宏大叙事，身在乡野的树田兄，只是一个小学生、初中生，不可能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书中很少涉及。在第一章“我的家乡我的家”中，倒是较多记录了那个古老的村庄解放初在历次运动特别是大跃进，以及后来文革中的变迁。

作者的家乡是山东省东阿县旧县村，这是个有一千多户人家，四千多口村民的大村。民国时，这样的大村，有许多名胜遗存，虽经多年战乱，都没有大的毁伤。旧县村和附近的村镇，历代留下了影壁墙、楚霸王墓、汉张迁碑、永济桥、曹植墓、秦氏节孝坊等若干处名胜。这些古迹在作者少儿时代，他都见过。但大跃进毁坏了很多。经过文革，除了极少数，如曹植墓尚在，张迁碑被移到博物馆，全部荡然无存。

他家附近的影壁墙东曾有十余方石碑，都是旌表本地善人义举的。最为突出的是作者的高祖张化鹏的懿行碑，光绪年间立，汉白玉石料，毁于大跃进和文革。古御道旁的龟驮碑，是明代阁老于慎行神道碑。几百年来闻名遐迩，毁于文革。植有汉柏四、五株，古碑数方的楚霸王坟墓，在大跃进中被夷为平地，现只存半块残碑。

至于旧县村所在的东阿县，原来叫东阿镇（后又改回原名东阿镇，不过隶属

平阴县了），更是一个名镇，春秋时期称为谷邑，是齐相管仲的食邑，曾与茅台镇、景德镇齐名。作者1957年读初中时，县里的古城墙、城门、文庙、县衙、城隍庙等都称完好，大跃进和文革中均遭毁弃。

于慎行，是作者家乡的大名人，万历帝师。他的陵墓和祖莹“于林”，系鲁西南地区知名的家族园林，是曲阜孔林、邹县孟林外又一名门墓地，具有重要的观赏和文物价值。据记载，于墓規制宏大。墓门外有对狮。甬道两侧有石俑、石马、石羊、石虎和华表各二。还有东西石碑，刻有万历御书的“帝锡玄庐”坊，十三方圣旨碑等。万历还御植白皮松100棵。墓前有邢侗书丹“于文定公墓”碑。这片原由于氏后人管理了四百余年的墓地，在1967年，被远在聊城师范的“革命小将”劳师远征，彻底毁坏。于被挫骨扬灰，碑刻石雕被砸烂后修渠铺路。只有于慎行的墓志铭被其后人设法保存下来，成为控诉“红卫兵”暴行的物证。

文革毁灭的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何止亿万！旧县村、东阿镇的遭遇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呜呼！如此罪恶滔天的文革，近年竟有人称之为“艰难探索”，竭力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张目。好在有树田兄这样的亲历者，悉心留下诸多史料，让后人窥斑得豹，不使谬种流传。

历史上秉笔直书，称为“董笔”，树田兄的文字也是“董笔”。这支笔，在全书的各个章节任意挥洒，直言无忌。其中第三章《不平凡的中学六年》最值得注意。这一章共40节，是全书的一个重点。它写到了反右，更集中反映了大跃进、大炼钢铁、浮夸风、打麻雀、大饥荒的乱象。稍微了解一点当代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上世纪中期一出接一出的极其荒诞、极其丑陋的闹剧。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反右——

小小的年纪，当然不懂反右是怎么回事，但他的印象是，身边的右派都是好人。如旧县小学的杨老师，寨子村的张若秋老师等等。最可笑的是，树田兄自己也差点挨整。只因在小整风中，他检讨了生活散漫的缺点，不想被一个小伙伴揭发，说他对合作化不满，证据是他说合作社的马死了，社员们分吃马肉。其实这纯属编造，他们村里既没有马，更没有吃过马肉。老师保护了他。但那个小小年纪就想邀功请赏的伙伴，让他齿冷心寒。

大跃进和浮夸风——

全国性的：十九个省宣布消灭了文盲。很多省、县、公社，几天之内办起了若干大学。河南登封县文村乡(公社)办起了十二所大学。方城县建立了三百多所文艺学院。作家康濯在一篇报道中称，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身边的：班上一位同学宣读了自己的跃进目标，两年内入党，三年内赶上郭沫若。学校有块试验田，校长定了单产十五万斤的指标，最后亩产五百多斤。学校西面建起炼铁炉，炼出许多大铁疙瘩。他亲眼看见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上面粘着“铁锅碎片、门鼻子、小截铁链，没烧透的焦炭，没融化掉的铁矿石、碎煤”。

上面乱指挥，下面瞎胡闹。1958年7月底，他在村东看到一个社员赶着牛把玉米地犁掉准备插红薯。那时玉米已经抽穗了，为啥犁掉呢？这个社员回答：“队长安排的。”这块地最后绝产！

树田兄认真查阅了有关统计数字，每次都不一样。比如1958年粮食产量，到底是多少，究竟信哪一个？

1958年10月——8000亿斤。

1958年11月——8500亿斤。

1959年4月——7500亿斤。

1959年8月——5000亿斤。

2011年1月——3953亿斤。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假话成风，摧营拔寨。树田兄所在的平阴二中《校志》载：“1959年下学期，济南市对重点学科(语文、数学、外语)期终进行统考，二中各科总平均成绩79.63分，获得全县第一名。”这有整有零的数字从哪里来的？原来考试时，和试卷一起发下来的还有一张标准答卷，考完全部收回。那为什么总平均成绩只是79.63分呢？树田分析，这样才显不出作假。而且可以证明，学生参加那么多运动，牺牲了那么多学习时间，还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这是路线方针正确啊！

大饥荒——

大跃进、浮夸风带来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树田兄举了个小例子：每天饭后的第一节课后，小便处人满为患。为啥？学校每天每人的口粮是8两红薯干，外加照得见人影的稀汤水。

俗话说，粮不够，瓜菜凑。但是，那时连瓜也没有。树田兄报出的代食品是：红薯叶、胡萝卜缨、辣萝卜缨和辣圪塔缨、榆钱儿、榆叶、洋槐花、洋槐叶、插杨叶、梧桐叶、柿树叶、柿子落果、榆树皮、马齿苋、灰灰菜、米篙、猪牙草、蓊蓊菜、白蕻、苘叶、茺茺苗秧。他郑重声明：这些都是我的父老乡亲赖以度荒活命的食物，而且我全部亲口吃过。

树田兄还隐晦地写道：1957年我们入学时是四个班208人，而毕业时只剩三个班133人，中途流失了75人，占36%！因为生源短缺新招高中两个班只招了84人。高中阶段又流失学生28人，占33.3%。高中毕业时只有56人，每班不足30人。至于“流失”的同学哪里去了？就请读者自己去联想吧。

树田兄上大学的第三年，文革爆发了。此后，一直到他分配到凤台县的头几年，整个社会都处于文革的动荡之中。作为同在北京念大学的当事人，他对文革种种乱象的详细、生动的描述，常常引起我的强烈共鸣。读了这些貌似平和，实际饱含愤懑的文字，读者大概可以了解什么叫十年浩劫，什么叫天下大乱，什么叫无可奈何。

文革开始以后，他在学校只能干这些事：到清华大学参加批斗王光美大会、批斗彭德怀和罗瑞卿大会。参加学校批斗“三胡一王”（胡耀邦和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大会。参加批斗“小反革命”（两个小学四年级的小姑娘）大会。参加“八一八”和其他几次毛泽东接见接见红卫兵。到山西、陕西、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大串联。上面打倒了什么人，要开会声讨；毛泽东有了什么“最高指示”，要连夜游行庆祝。课是彻底停了。造反派们到各地煽风点火。树田兄这样比较保守的学生，只能在学校“混”日子。

其实，文革期间，在北京的大学中，北农机的运动还算是比较平缓的。清华、北大，我的母校人大，都发生过因大规模的批斗和武斗，惨死多人甚至几十人的悲剧。这种极端混乱、完全无序的状况，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是很难想象，也很难理解了。

树田兄毕业后分配到安徽凤台，第一个身份是宋小店农场工人。社会上的状况是否比学校好些呢？文革期间，任何地方，其他都是“副业”，主业仍是“革命”。到农场不久，就赶上整顿阶级队伍，他先是外调本场职工历史问题。后来又参加集训，编入县里派往各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是“斗批改”，就

是“一打三反”，还到过公社广播站，把县广播站通过电话线送来的信号放大后，输送到公社装有扬声器的用户。广播的内容，无非是最高指示、大批判文件、赞颂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样板戏、革命歌曲。

直到调县农机二厂当技术员，后来又粉碎了“四人帮”，树田兄才算开始干点正经事。这几年白白流逝的时光，也在《一路》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历史最重史事。史事，可辨善恶仁暴，可供镜鉴正衣。只要事实真确，无论黄钟大吕，无论丝竹铙钹，都是历史交响的一部分。树田兄为如实记载那段历史做出了贡献。

三

这本约20万字的私家叙事，记录着一个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年逾古稀的老人亦步亦趋的真实足迹。他的每一页文字，每一个故事，都是这段历史是现实影像。

树田兄在写作过程中，查证了大量历史档案（包括统计局国民经济发展公报、中共重要会议公报等）、报纸杂志（如人民日报、安徽日报等）、相关人士的回忆录（如杨献珍的《一九五九年纪事》等）。还看了不少地方志、校史等资料。可与其他文献互为印证具有历史意义，可供研究参考，赋予了本书一定的文献价值。

从“史文”的意义上，《一路》的文风也值得赞赏：明白晓畅，朴实无华，不事雕琢，还带有一点乡土气息。

叙述往事，如果缺少细节，就会枯燥无味。好在树田兄记忆力极佳。在前几章，他回忆少儿时的生活情景，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描写和刻画，绘声绘色，读起来饶有趣味。

家乡的民风民俗，孩提时的各类游戏名称、玩法，上小学时课余生活如割草拾柴、野餐、捉蚂蚱、看戏，走读时“偷食”麦粒、红薯、玉米的种种花样，都有详细记述。春节期间置办新衣，碾米磨面、蒸干粮、磨豆腐、办年货、大扫除、贴春联、请拜家堂、放爆竹、吃饺子、大拜年等一系列规矩和礼数，也都不厌其详，一一介绍，让人如闻如见。

对人物、事件的描写，常有神来之笔。

“（外祖父）走坐间手中一直把玩着一对实心铁球，人未到就听见哗啦哗啦的声响。他吃饭狼吞虎咽，到我们家做客时奶奶包饺子招待他，回家说不出是什么馅儿。”一个性格豁达、不拘小节的老人呼之欲出。

“有一次我参加了夜战，有一组社员把水车的铁链摘掉，把马灯挂在水车拉杠上，几个人轮流推着空转。干部们远远望去，很像是在挑灯夜战热火朝天大跃进了。”百姓厌恶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歪风邪气，用这种恶作剧来糊弄上级，让人不由会心一笑。

（在学校）吃饭时他吃了两个（包子），把留下的两个带回家交给了奶奶。那天，还没落太阳，“奶奶告诉我：‘你拿来的包子馏了馏给您爷爷吃了。’”话音刚落，见到满面菜色的爷爷咂着咀从他的小厨房走了进来。”“面有菜色”的爷爷，不等饭点，迫不及待地吃掉孙子勒紧裤带省下来的两个包子，“砸着嘴”走出小厨房的描写，不禁让人酸心泪目。

女社员差不多每人都带有一条胳膊粗、长长的布袋子，妇女们可以把撸下来的麦、豆、谷子等装入系在腰间回家充饥。“张林才（队长）常常到即将收工时对妇女们说：‘我有点事先回去了，你们干一会儿就收工回家吧！’于是妇女们心领神会，四散到周边庄稼地里去各取所需了。”“布袋子”这个细节，使人们看到了当时非常珍稀的基层干部的人性光辉。

在第三章中，有一段几个老农“妄议时政”，让人印象深刻：

“一次，接近七十岁的孟吉珍老人过路对我大声说：‘树田你说，彭德怀立了这么大的功，又把人家治下来啦，这还不是卸了磨宰驴呀？’另一次，一位秦姓老农小声问我：‘你说，照这样败坏下去，共产党还能撑多长（时间）啊？’还有一次几位老汉议论彭德怀，其中有位老汉说：‘没听说朱洪武火烧庆功楼吗？一样的！’”短短几句话，就把底层老百姓对彭德怀的尊崇，对毛泽东整治彭老总的的不满，活灵活现地描画出来了。

在第六章中，他记述了下乡当阶级教育宣传队期间的一件小事：

“有一位我不知姓名的社员说的话，我印象极为深刻，这位男子说了他与人吵嘴的简要过程后，最后说了，‘怎么的啊？我是贫下中农！他是什么人？他是刁计巴大学生！’”树田兄说的这个细节，说明了好几个问题。一，农村哪有那么多阶级斗争，都是浪费时间，运动群众。二，家长里短，妇姑勃谿，根本不需

要宣传队整天宣讲。三，文革中一味贬低知识分子，无端激化工农兵与知识分子的矛盾，有百害而无一利。

“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一路》是一本通俗、晓畅、生动、形象的读物。我相信，即使内部出版，也会拥有许多读者，也会得到广泛传播。

四

前面所说的“史事”“史文”，当然很重要，但这本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史义”。

《一路》以叙事为主，但夹杂着作者很多议论。这些议论，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和济世情怀。对那些邪恶的、不公正的、对百姓有伤害的事，他一边如实记录，一边忍不住要发表议论。当然有时说了也白说，还是要说。不能公开说，就私下说，至少可以“腹诽”。这既是出自农家子弟的朴素情感，也是实践着做人要诚实、正直的传统理念。他入了党，被教导“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宗旨，更是自觉自愿地以此为依归，即使这个党已经严重背离了初衷仍然一如既往。从政以后，他秉性不改，不平则鸣。不仅“鸣”，还要“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百姓争权利，谋利益。这一点，让人感动，让人尊敬，让人钦佩！我读此书，总觉得身边涌动着一股沛然之气，辉耀着一种“义”的光芒，磅礴着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

“部长们，生产钢铁、钢材的设备究竟有多大，难道竟那样心中无数吗？怎么在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竟然荒唐到这样的程度？”质问部长，义正辞严。

“郭沫若、钱学森、周建人、康濯，这些大知识分子，是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应该是社会的楷模，民族的良心，但他们做了什么呢？”反讽“大人物”，不留情面。

“人人头顶都高悬利剑，最高领袖的意志是不可违拗的，顺者昌逆者亡，残酷无情绝不含糊，最高领袖以外的人们心中唯此为大，其他就顾不得了。”

“最高权力掌控者真正是无国法、无党纪，无任何约束，无任何畏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横行恣肆，为所欲为。为争夺权力、保住权力、扩大权力，不择手段，不计当时信誉，身后名声，目的就是一切。”

这两段，就是对最高领袖的直言不讳的声讨了！

有的人，当老百姓时，可以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但当了官，有了进一步晋升的机会，就完全变了。常常昧着良心说假话，一心逢迎领导，整天琢磨怎么进一步往上爬。树田兄却一如既往。唯一不同的是，他更注重实干了。

树田兄在县（区）级基层政权工作的三十年，是他“在其位谋其政”，实现其“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做些事”愿望的三十年，也是他亲自参与、体验和认识“新中国”执政特色的三十年。

从第八章起，一直到第十四章终结，写的都是他从政的经历和感触。我以为，这部分内容，是本书最具价值的篇章。如果说，前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单纯质朴、耿直率真的小青年的身影，那么，后面我们领略的就是一个成熟男子汉的责任担当、职业操守和道德勇气了。

一个好的干部，对百姓疾苦应该感同身受，对那些啼饥号寒、生死攸关的景象应该永志不忘。树田兄就是这样一个人。1985年淮南“三二”矿难，1991年的“九一”大水，是他生命中难以释怀的惨痛经历。坑口孤儿寡母撕心裂肺的呼喊，大堤上挈妇将雏简陋的窝棚，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牵挂。

树田兄最后一个行政职务，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当了两届。他这十年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为百姓争利益。不管前面挡路的是什么人，不管他的后台有多么硬，他都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书中有一节关于凤台大桥的故事，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凤台濒临淮河，为了交通便利，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修了一座大桥。之后不久，一家面目不清的公司突然介入，仅仅把两公里多的道路铺了一层薄薄的柏油，就设了收费站，收取大桥一侧车辆的“过路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树田兄立即批示，调查处理！

他后来才知道，这个公司背景十分深厚，后台和支持者包括省委书记的秘书、省财政局、省交通局、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新华社安徽分社等一大堆单位和个人。树田和县人大代表，先后多次向县、市、省领导汇报，要求驱逐这家公司，都石沉大海。很多有头有脑的人还反复劝他偃旗息鼓。有一次，树田兄冒着极大风险，直接找到了省人大第一副主任反映此事，没想到也碰了大钉子。这个貌似憨厚、温良的男人，着实怒了。他要单枪匹马，挑战这个官官相护、合伙坑人的衙门体制！

树田兄是有思想准备的。他担任人大主任后，恶补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搜集了大量改革开放的文件，也认真研究了发达国家议会运作模式。他知道，宪法虽然规定各级人大享有很大的权力，但基本是有名无实。但是，既然法律赋予了权利，为什么不用？他要把“人大”这个监督一府两院纸面上的权利，变成实实在在老百姓看得见的利益。曾有人问他，到人大还想干什么呢？他的原话是：“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只是看到可怜的老百姓任人无法无天地掠夺宰割，想护他们一把！”真正是掷地有声！

他根据《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职权的第四项就是“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主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凤淮路大山段收费站的决定》，立即以正式文件向县政府发出通知，并向社会公布。

这种做法，史无前例，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安徽青年报》发了新闻：“县人大和省政府在桥头撞了车”。他趁着省人大召开全会的机会，用质询的方式要见副省长，这位副省长对“质询”二字很恼火，要求改为“约见”。开始，副省长还为错误决定百般回护，但在树田等代表有理有利有节的陈述面前，终于败下阵来。最后不得不同意取缔那家公司的收费，一切恢复原样。

一个小小的被视为“退居二线”的县级人大主任，与一堆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的在职官僚做了一次拼死抗争，居然取得了胜利！这真是一曲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凯歌！我为树田兄的凛然正气击节赞叹！

《一路》的第十一章，题目叫“‘议会’生涯琐记”。后面的三章，也都是记述树田兄在两级“议会”任上的工作。人大，并非西方的议会，所以树田兄在议会两个字上打了引号，但人大与议会在功能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他借用“议会”这个概念，就是想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在我们这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究竟是不是应该发挥，或者怎样才能发挥“人民代表”对执政者的监督作用。

树田兄在努力探讨，并在实践中尽量最大化地、创造性地发挥着这种作用。在他任职期间，他做了好几件这样的好事。比如，取消虚假的棉花订购，农民不再“买棉花”完成指标；抵制粮食部门压级压价，农民卖粮少吃亏；切实提高农村学校的教育水平；不再强制基层订阅党报党刊；齐心协力保“两集”（县里的

两个乡镇），等等。这些事，没有一件轻而易举，但他都办成了。

树田兄能够办成，其他人应该也能办成。这其实是树田兄想告诉大家的一条成功经验。就在本文完稿时，树田兄在微信中，给我写了一段话，其中的意思他在书中也表达过。现照录如下：

“我当时能够干成一些事与多种因素有关。一，当然不否认我想干成一些事，也找到了可以干的事，如治理西淝河。二，是有些干事的能力和经历。三，是我有一些干事的政治资源，如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县人大主任，很配套，还列席县的书记办公会。四，是碰到一些好的领导者支持，没他们支持很难成功。五，是家属子女还算争气，不添乱，不拉后腿。六，是那时的政治环境比现在好，对人大和代表管得不太严，捆的不太死，当然我也不太尿他们那一套。”

树田兄还在书中探讨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人大代表的构成、产生机制、表决方式、人大与党委之间的关系，等等。当然，这些问题现在无法深入也不容深入探讨，只能浅尝辄止。但他发出了这样振聋发聩的警告：“我们的体制，我们的管理漏洞太多了，而且这是共性的普遍性的，我头脑充满忧虑和担心，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们的党执政五十多年了，这样的脱离人民群众真是不可思议！”

他晚年做的最大最难的一件事，是在他年满六十岁、卸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以后，以“光杆子”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担任省人大代表时完成的。这就是启动惠及三市五县（区）的“根治西淝水患工程”。

西淝河，是淮河的一个支流，入淮口有闸无站，形成流域两三年一次小灾，七八年一次大灾，老百姓饱受旱涝之苦。2001年大旱，西淝河断流，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亿元。2003年特大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12.47亿元。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把修建排灌工程提上日程。

树田六十岁的宏愿是，利用最后一届省人大代表的机会，为老百姓解决一个心腹之患。从2003年上任，他就开始调研，搜集资料，第二年提交议案，连续三年被列为省级人大“重要议题”。但到2008年退休，整整五年，也没有实质性进展。他像着了魔一样，死死盯着这件事。“净身而退”之后，他还是不离不弃，时时关注着项目的进展。一有机会，还会提醒各级领导不能半途而废。10年后，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12年后，西淝河工程终于开工。

这件事，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详述，堪称一部精彩的中篇小说。一介

匹夫，锲而不舍地为了一个目标，放弃了个人休闲安逸的退休生活，十几年如一日，不辞劳苦，点灯熬夜，唇干舌燥，焦头烂额，到处磕头，生气上火，他图什么？在一些人眼里，这是一个谜。

我也有一个谜，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项目，国家投资，地方受益，只造福百姓，不伤及任何人的利益，利在当下，功在千秋，怎么就得不到支持？从调研、立项、论证、审批、上报、落实，关键时刻，总是遇到重重阻力。在各级政府和机关，他不乏支持者，但更多的是猜疑抵制的基层干部、无所作为的同僚、虚与委蛇的上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高官。十二年的扯皮掣肘，他遭遇了多少冷眼、忽悠，见识了多少虚伪和丑陋！

这个排灌站，前年我在回凤台参加“老九”团聚时参观过，那时还没竣工。撰写此文时，我问他什么时候正式启用的。他回复：2019年3月。

“这天天气很好，碧空如洗，天朗气清，微风拂面。天空偶尔飘几朵棉絮般雪白的云彩。河面波平如镜，河边布满了渔民的拦网和网箱。一行行垂柳，一丛丛茭白翠绿欲滴。轮机过处，不时有野鸭、白鹭和一些叫不出名称的禽鸟儿，从树丛、苇丛中成群飞向碧空。”

这段话，是树田兄在项目进展走上正轨后，首次全程巡视县境内西淝河时信笔写下的。在这本书里，难得见到如此抒情的文笔。他的心情大好，十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他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其实，他也没有休息。这本书，就是他“休息”时，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凤台县原属阜阳地区（后改市），阜阳出过两个全国闻名的大贪官：王怀忠、王昭耀。这两个人，后来都官拜副省级。但是，殊途同归，二人因贪腐先后落马，一个死刑，一个死缓。

树田兄认识这两个人，一个还是大学同学、山东老乡。但他绝不走他们那条路。他的官当得很小，他的路走得很长。如今走在凤台县大街上，还会有老朋友打招呼。闲时，他常到南京、瑞典看看闺女儿子，孙子外孙，尽享天伦之乐。

路是人走出来的。不一样的人，走不一样的路。

皓首回眸，感受迥异。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2019年11月21日

【述往】

清华文革的记忆

老唐

四清戛然而止 文革仓促上阵

1965年，我们射击队随同校体育代表队在延庆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到1966年5月，突然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四清运动只能无果而终，那些未调查完的专案，未下的结论，都一风吹掉了。谁知道我们就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扔下这个棒子又去掰下一个玉米棒子，从一个人整人的运动，迅速进入另一个更加残酷，更加惊心动魄的人整人的运动。

在回校的客车上，同学们心情无比激动，我们终于赶上一回这样伟大的文化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我们年纪尚小，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次可要紧紧跟着毛主席在惊涛骇浪中，增长阶级斗争的才干了。

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国际歌，一时间，群情激奋，热血沸腾，有的同学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还有的人已经想好了，下车要干的第一件事。在清华园大礼堂附近下车，一下车就有人出面组织，拉住了张慕津（永宁分团副团长，原清华大学团委书记）高国英（阜民街四清队长），就像那街头的飞行集会，大家围住他们俩高呼口号，打倒张慕津！打倒高国英！打倒张慕津！打倒高国英！二位一下子懵了，低着头一言不发。敢情“被批斗”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上手。几分钟批斗完毕，然后就各自回班、回队去参加这伟大的革命了。清华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让我不知所措，我们仓促上阵，头脑一时适应不了，就仿佛被扔进了一台洗衣机，随着波轮搅起的强烈水流，身不由己地左右翻滚，上下折腾。

老兵掌权，血统开道

初期，清华园里派进了工作组，把一些怀疑工作组的同学打成了反革命或坏份子，后来有王光美到饭厅给同学打菜，再后来，有周恩来两次来清华东操场，给蒯某平反，并宣布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后运动风起云涌，在清华园里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文革大戏。

老红卫兵掌权了，吹捧谭立夫讲话，推行血统论，辩论会上高喊，老子英雄

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报出身！报出身！这个血统论一看就觉得无比荒谬，用现在网络语言说，是属于精虫上脑的东西。文革后的几个事实用来批驳血统论，很有说服力。朱德够英雄吧，他的孙子不也是犯了罪被枪毙了，李双江够红吧，他儿子不也是一个罪犯吗？老毛最红最红了吧？你看他孙子写的那字，就别提多丑了，真让人忍俊不禁，还到处去题字，都不觉得丢人，讲出几句话来也让人笑掉大牙，说什么对二战贡献最大的就是我爷爷和斯大林，太可乐了吧！他那个外观形象，也让人不敢恭维，吃什么会胖成这样，这种二百五的样子难道也是英雄的基因造成的吗？

当时。我对这个血统论极力反对，在日记本上写了一篇“评谭立夫讲话的反动本质”，后来到福州串联时，被某些中学生抄到了大街上。当然，这些中学生也是受血统论迫害和歧视的可怜人。血统论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至今遗毒也没有肃清。

强撕大字报, 拉倒二校门

66年八月中旬，大礼堂区的大字报，不少是针对中央干部的。8月24号的下午，我坐在礼堂前面的台阶上休息。见到一大群中学红卫兵，从北面跑步过来。把大字报区团团围住。领头的，我认识，就是我弟弟涤非他们水工93班的同班同学马楠，号称瘦马将军，他身着高级黄绿色呢子军装，袖口露出一截白衬衣，左臂上戴着红袖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指挥着这帮中学生。他也认识我，目光相遇，各自无言。他们来的目的是要野蛮地撕下大字报，不让人说话。钳人之口，自来都有，但这次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令人目瞪口呆。我依然坐着不动，瞪着他们，看尔横行到几时！

当天傍晚。马楠又与贺鹏飞（贺龙元帅的儿子）一起指挥拉倒了二校门。我去晚了，那个美丽的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的二校门，那个具有青砖白柱的牌坊式校门，那个装饰有漂亮三拱的清华标志性建筑，就让这帮暴徒给变成了一堆碎砖头躺在地上，欲哭无泪呵！只见到一帮清华的中层以上干部在那里被人驱使着搬运砖头，稍有不如意，便有人操着皮带当皮鞭伺候。

这些老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后来对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认真地进行反省和忏悔，甚至有少数人还在梦想回到毛泽东的文革时代，原因就在于没有对

文革进行全社会地批判和反思。瘦马将军在文革中指挥破坏清华园的标志性建筑，是一种罪行，至今未见他忏悔和道歉，这种顽固坚持文革立场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成为了文革的遗老遗少。

如今的教科书中，对文革这段历史都做了淡化和遗忘处理，以至今日之少年提到文革，脑中几乎是一片空白。，难怪到今天还有人认为，红色基因可以代代相传。红二代、红三代掌权，最让他们放心。一代传一代，实际是一代不如一代，谬种流传，贻害万年！

出身是软肋，自己寻乐趣

风卷云涌，不久就把老红卫兵从清华舞台卷下去了。之后，又成立了八八派、八九派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旗红卫兵，延安红卫兵，令人目不暇接，真好似城头变幻大王旗，全都誓言无限忠于毛主席。大多数的红卫兵，出身好是必须的。本来思想红卫兵准备成立一个东方红公社，打算吸收一些出身欠佳的同学，计划给他们配带方形的胸章，我盼望了一些日子，没有下文，终于也失望了。不过又想想，戴上方型胸章，不正表明你是个下等人吗。

我的出身属灰色地带，知识分子家庭，既不红，又不黑，自己都不好意思去要一个红袖章带上。我在射击队的队友张永治和我情况差不多，因此，我们俩对运动，属于不甚理解、不够得力那种人，但还没有完全逍遥，而是有机会就去参加自认为有意义的活动。比如射击队到延庆的小长征、到宣武民用炉厂去翻砂劳动、参加郭九洲联系的，到永定门机务段火车上去当见习司炉、参加机械系同学到山西灵丘县远距离的长征、和北大同学孙慧军一起骑车到天津，去宝坻县拜访小学同学，已成为下乡知青标兵的侯雋。不承想，那次去拜访侯雋竟使我在天津深陷囹圄（以后另有文字叙述）。

由于出身这个软肋，我几乎不写大字报，但却有一个独特的毛病，看别人大字报的精彩之处，想赞扬，异见之处，想争论，我经常拔出钢笔，在字里行间书写一个自认为精辟的小批语，署名为无敌，这个无敌二字的署名在清华也算小有名气，许多人，见过这个批语，却不知道是谁写的，也有人用钢笔和我论战，我一般也不去搭理他们，钢笔写几个字那能说得透彻。

清华红卫兵后来分裂为团派总部和414派总部¹。我一直坚定地为四派写批语，同学们称我为杆儿四，我弟弟涤非则被称为杆儿团。杆儿就是铁杆，坚定不移的意思。一家人，出现对立的两派，在文革中屡见不鲜。但一家出两个对立的杆儿，则有点少见了。

说到写批语，想起一个秀书法的趣事。我班同寝室的同窗胡鹏池。常常在大礼堂附近显眼的地方，贴出他的书法，他的仿毛体练得龙飞凤舞、炉火纯青，每当贴出一张，就会围了很多人看，我亲眼见到，有人怀疑是不是印刷的？于是用指甲去刮那些字，发现掉墨了，这才相信是现写的。我们射击队的石应津，非常欣赏他的书法，托我向他求字，胡鹏池就很慷慨地给她写了两张。

出手很孟浪 芷君请原谅

记得有一次在主楼往二校门方向的马路旁，老四的同学正进行一场小型批斗会，一些同学把团派的陶德坚老师围在中间，正在批判。我刚好经过此地，只见一个短发女同学喊着，你们不能批斗陶老师，一面往里挤，想去保护她的老师。我到近处才看清楚是我们射击队的女队员杜芷君，我赶忙上去，用两手扣住了他的两只手腕，说你不能搅乱这个批斗会，她看清是我，既没有说话，也没有挣扎，也没有愤怒，也不再往里挤了。平时我们在一个饭桌上吃饭，相处的挺好，他是建筑系9字班的，平时话不多，很文静，练习也很刻苦，大家印象也都不错。几分钟后，这个飞行批斗会就结束了，我自然也就放开了她的双手。没想到，我们射击队的不同观点的男女队员，居然以这种方式有了肢体接触，要在平时早就脸红了，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老师，我是为了老四的批斗会能继续下去。其实到今天，我也不了解陶德坚老师，不知道她究竟有哪些错误观点。当时的孟浪举动大概也是派性使然吧。奇怪的是，我抓住他的双手后，俩人都很平静，没有一点不好意思。五十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杜芷君的消息，如果能再见到她，我一定会给她一个道歉，相信她也会原谅我。

¹ 团派与四一四总部不是由清华红卫兵分裂而成的。在清华所谓的老红卫兵就是清华红卫兵，由刘涛（刘少奇之女）、贺鹏飞（贺龙之子）刘菊芬（刘宁一之女）为头，清华红卫兵也称为八九派。是1966年八月九日成立的，是保工作组的保守派。团派与四一四总部是由清华井冈山兵团分裂而成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是1966年10月以后才成立的，是由蒯大富、鲍长康等为头头，一般即称之为造反派。1967年4月14日正式分裂为团派与四一四派。团派总部的头头仍然是原井冈山兵团总部关头头的那几个人，四一四的总部的头头则是数力系九字班学生沈如槐，自控系六字班学生孙怒涛等。

领袖尚武 百姓遭殃

群众斗群众发展到高级阶段，必然要兵戎相见。清华一旦进入了武斗阶段，前面那些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打嘴炮，就都化作小菜一碟。清华的百日武斗，虽然比不了外地，如重庆、广西的大型武斗，但是在首都，在中央眼皮底下，也真够残酷血腥的了。十八人死亡，三十多人终身残疾，一千一百多人负伤。在北京的高等院校里，绝对首屈一指。

1968年4月23日。清华百日武斗开始了。武斗是由小到大，由点到面，逐步升级。开始你占一个楼，我占一个楼，封窗户堵楼道，然后拆开暖气片，用来从楼上向进攻者身上砸，用车胎做大弹弓，碎砖头当弹丸，再往后开始焊红缨枪，再发展到了铝合金长矛，再配上盔甲、头盔，中世纪武士的装备就几乎全了。最后就是，半自动步枪、手榴弹、地雷等战争武器全都登上了清华武斗的战场。

月光惨淡，尸体冰凉

68年4月27号，为了储备粮食，在9饭厅前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对战中团派的一辆解放牌卡车，直接冲向老四的人群，把谢晋澄同学碾压死了，这辆卡车夺路而逃，在慌乱中被电线杆的钢制拉绳挂住了，侧翻在地，司机立刻逃跑了，老四一湧而上，为战友报仇，把汽车彻底破坏了。

当晚，我到现场去看，汽车侧翻着，气缸周边能拆的零件，都被拆光了，谢晋澄同学的尸体就躺在5号楼的西北角。我掀开脸上的白布，见到他的头皮向上挫开，露出森森白骨，面貌极度的变形，令人不寒而栗。

运动初期在二号楼，有想不开的老师跳楼，我见到在泥地上砸出一个坑来，人已经抬走了。这一回，在惨淡的月光下，在手电筒的照射下，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白天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学生，晚上就躺在楼角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

老四占领科学馆的初期，白天还可以进出，在那里，我见到过蜷缩在墙角地上的一个同学，浑身血污，一动不动，仿佛已被遗忘，大概是长矛战的伤员，也不知是团派还是四派，无论哪一派，不都是在捍卫老毛的革命路线吗？难道必须这样骨肉相残、刺刀见红吗？就不能有话好好说吗？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百思不得其解。

面对杜芸，无言以答

九饭厅抢粮战斗的第二天，在河边的十饭厅门口，中饭后遇到了射击队的女队员杜芸，她是水9的，和我弟弟一个年级，她激动地一把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腕，问我：你知道昨天9饭厅的长矛战吗？一个老四被汽车碾死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昨晚还去看过，那个同学叫谢晋澄，头皮都碾开了，模样好可怕。

两派都用上长矛了，都打成这个样子了，你说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

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一时无言以对，我知道杜芸的父亲是昆明医学院的院长，家境不错，这样惨烈血腥的武斗，对于一个平时就显得有些羞涩的女同学来说，刺激实在是太大了！已经让她在精神上受不了。

迟疑了一阵，我说，两派都说是保卫毛主席，却把对方视为敌人，要杀死对方，我想不通，究竟是为谁拼命呢，我也想不通，我也没有好办法，不然你还是先回家去吧。后来，她究竟走了没走，兵荒马乱的，就再也没有消息了。三十多年后，在昆明又见到她，那天劝她回家的事，还依然记得。

运动不理解，退出清华园

自那一天起，我陆续说服我们班准备留校坚持战斗的老四，希望不要参加武斗，万一受伤或丢了性命，怎么向家里交代？究竟为谁战斗也说不清楚。还是回家吧。也许是我的劝说起了作用，也许是他们拿不定主意，总之最后都决定回家了。我们在七饭厅借了一辆三轮车，把大家的行李装上车，由我和陈志昌骑车往和平里到我家去。陈志昌第一次骑三轮车，在北三环路上，把车骑进了沟里，幸好我俩都没有受伤，几个同班的老四，在我家住了几天就陆续买火车票回家去了。

别人认为我是杆儿四，我也认为自己是铁杆。但只是用钢笔写批语的铁杆。真到了要动真家伙的时候，我就退缩了，草鸡了。所以对于留校坚持的，无论老团还是老四，我都佩服他们，敢于用生命和鲜血捍卫自己的观点，就算历史证明，参加武斗是错的，主要责任也不在他们，而要由高层号召武斗的领袖来承担。

膛线模糊，子弹横飞

团派凭借蒯某的名气，在武斗中占尽优势，借着和外地造反派的关系，轻易

地获得了不少正规武器。四派物资缺乏、经济困难，总是被动挨打，最后退缩到主楼一带，但仍处于被包围的态势之下。

我虽然在家里逍遥，但是心中苦闷，听到老四处境困难，科学馆人员被困，不能突围，射击队的金水高被燃烧弹烧伤了脚，都很为他们担心，也想能为学校里的老四做点什么。

从农业大学方向有一条现挖的壕沟，可以避开子弹进入主楼。在实验室里，我看到有同学正在用车床给钢棒打孔，还用冲子冲出膛线。我拿起一支枪管从后端望出去，枪膛里麻渣渣的，一点也不光滑，膛线也模糊不清，要知道我们射击队员是经常看枪膛的，好的膛线应该是像镜面一样亮闪闪的，膛线从后面旋转着奔向枪口，好似万花筒中的奇妙图案，也像老照相机的快门。这支枪管的膛线让我怎么形容呢？实在是太差了，但我不能给他们泼冷水，用这样简陋的设备造枪，实在太难为他们了。我告诉他们，过几天我来帮他们试枪。

几天后，我们在楼道里摆了一张桌子，桌上固定一个虎钳，用布包着枪支夹在虎钳上，大约四十米处放了一块绘图板，在扳机上拴上一根绳子，人离的远一点，是为防止炸膛。装上子弹后，我小心翼翼地拉动了绳子，一声脆响在楼道里回荡，比空旷的声音大多了，子弹顺利地出膛了，大家高兴地奔向靶板。怎么这样呢？不会吧？只见那颗子弹横着砸进了图板，侵入一厘米深，这可是用的正规的军用子弹，怎么会横着飞呢？打了那么多枪，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看来膛线根本没起作用，这种效果，只相当一只火药枪！试射不成功，这种枪基本不能用，没有精度、没有力量，如果在五十米内击中人体，伤口倒可能非常大，子弹提前翻滚，杀伤效果是无法想象的。造枪失败了，四派武器上的劣势始终没能改变。

试验室的同学告诉我，咱们手榴弹造得不错，说着拿出几个给我看，外观还算漂亮，木柄上涂了清漆，可是没有后盖，只是用较厚的蜡纸封住后面，我想到武斗可能会延伸到清华外面，就要了三颗手榴弹，藏在家中壁柜里，对谁都没说。

满天阴云，终有晴日

游离在社会上的日子，就是天天在混时间。九洲有时来我家，我帮他一起焊收音机，张永治来的多些，陪我爸下围棋，我爸的水平比他差了一大截，胜出机会很小，但仍然乐此不疲。

学校里不断传出各种消息。高校的击剑重剑冠军许恭生同学在东操场武斗中阵亡，我俩是一个年级的，都住七号楼四楼，互相都认识，英才早逝，令人悲痛。科学馆的屋顶被燃烧弹烧光，被困人员挖地道突围失败，挖掘人员被抓走，里面的伤员运不出来，粮食又告急。这些悲痛的消息令人感到没有希望，武斗何时能结束呢？清华园何时才能恢复往日的宁静？

7月27日，终于传来了工宣队进校的消息，老四缴械投降，老团负隅顽抗，还打死打伤了不少工人，终于也投降了。情况究竟怎么样？想去学校落实一下，九洲、永治和我约定去一趟学校，先看一下形势再说，讲好在南门集合。

那天乌云密布，我骑车出去不久就掉雨点了，忙把雨衣穿上，很快小雨又变成了瓢泼大雨。我心中想着要在路上完成一件事，清华的武斗结束了，我留着手榴弹也没有用，交给工宣队还会自找麻烦，干脆自己处理了省事，以前没有扔过手榴弹，这次正好体验一把，骑到学院路土城附近，有一个豁口，过去一看，有一条南北方向的护城河，周围都种着老玉米，这地方不错，一个人也没有，此时天空中黑云翻滚，雷声隆隆，震耳欲聋。

我从挎包里拿出手榴弹，两个小的一个大的，先扔小的，撕开封底的蜡纸，把拉环一扯就扔了出去，轰的一声炸了，接着又扔了一颗小的，又响了，这老四造的土手榴弹还真棒！最后一颗是个大号的，为了安全，我要扔得远点，出手后大约四秒钟爆炸了，声音明显大了许多。这时我听到了一种怪异的铮铮的声音，这是什么东西在响？我抬头四处张望，只见头顶上有几条高压线通过，其中一条正在颤抖，发出声响，我的脑袋顿时就大了，头皮发麻，从头发根里冒出汗来，弹片打着高压线了！我两眼发直，原地发呆一分钟，高压线要是断了怎么办？造成停电是多大的损失？我不就成了破坏份子、现行反革命了吗？

看看周围还是没有人，高压线也停止了摆动，我的心跳也渐渐趋于平缓，继续骑车到了清华南门，雨已经停了，见到九洲和永治，都说今天的雨下得好大，雷声也特别响，穿着雨衣，裤子都湿了，随后我们就一起进到清华园，学校形势大变，工宣队进校的消息是确实的。不久，大家就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学校。进入文革复课闹革命的阶段。

以后，每当想起那天的事情，还是非常后怕，武斗停止了，我倒是差点主动戴上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结 语

小小清华园的文革经历，是全国文革的一个缩影，一个传统的书香之地，也上演了斗争的最高形式，美丽的校园变身流血的战场，同室操戈、不共戴天，冷血长矛、真枪实弹。

一个清华同学孙华栋，航海队训练队长，在代表队宿舍和我住对门，身体壮的像头牛，出生不是红五类，平时话语不多，武斗期间骑自行车经过第一教室楼，被老团抓去残酷毒打，把内脏全部打坏，不到一天时间就活活把他打死了，这是多么残忍的事，俘虏还要优待，他又没拿武器，就是德国法西斯用毒气害人，还得先关几天啊！没有这么凶残，这么丧心病狂的。孙华栋的结果是十分悲惨的。

另一个清华同学蒯大富，正如我班同学胡鹏池文章形容的，他是清华园的一只蝴蝶。在校园中扇动了翅膀。它和工作组的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几近完美，其作用远达校外和社会，他的材料甚至影响到高层决策，为此，成为红卫兵的领袖，为最高层所赏识和重用。

但是，蒯大富有样学样，在短短的时间就学会了暴力革命的冷酷、狠毒、草菅人命，为谋权力不择手段，脑袋时时想着权，两眼时刻盯着权，双手紧紧抓住权，信奉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把人民日报睁眼说瞎话的本事全学到了手。他“智擒王光美”、不断升级武斗、残忍打死对方俘虏、广播中整天污蔑栽赃反对派、悍然向进校工宣队开枪、投掷手榴弹。从这些事已经看出，一个有本事，有辩才，有智商的学生领袖，一个原本朴实的普通大学生，一旦上了马列毛思的轨道，就必然会飞速地蜕变为一个阴险的政客、一个无耻的阴谋家，别无选择。如果这种人掌握了国家政权，人民将生活在怎样的恐怖之中。幸亏蒯大富被赏识他的人抛弃了，作为替罪羊投入了大牢，蒯同学也从如日中天一下落到了可悲的结局。

赏识他的领袖人物，在文革运动中整遍了身边的战友，有的被整死，有的被整残，如贺龙、彭德怀、彭真、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等等。同时，文革的绞肉机，也害死了两千万无辜的中国百姓。最终他自己也落的个孤家寡人、众叛亲离，眼看着文革走入无法收场的境地，无可奈何花落去，心有不甘难闭眼……他死后，连老婆都成了反革命的头子，落得自挂东南枝。

文革是一场反人类的运动。其规模之大，其惨度之烈，在地球历史上绝无仅有，无论是高居庙堂，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革命派还是造反派，无不深受其害。

虽然后来的当政者把它定性为十年浩劫，但从不敢发动群众深刻地批判这个运动，而是在历史文献中，在教科书中，尽量淡化，努力让人遗忘。

最近一段时间，在报纸、电台、网络上又有一股逆流。不让人说话，不得妄议某某，有不同看法即以文革式语言群起而攻之，网络上封号，动不动扣上反某某的大帽子，还扬言要开除出某组织。一时间，文革鬼影幢幢，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阴风阵阵，让人不寒而栗。

今日写点小文回忆文革，只缘妖雾从未清，为阻止文革回潮尽一点绵薄之力。若问文革有无一丁点好处，只能说有一点，让英明伟大走下了神坛，让“微不足道”的百姓开始清醒，破除迷信，重新评价这几十年的历史，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资讯传播的加快，自己也感觉到头脑更为清醒，与世界大潮流更加合拍了。

仅以此文章纪念文革中不幸逝去的同学和朋友们。📖

【述往】

1973-1977: 我的“二外”记忆 (13)

——“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

李红云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工作会议。关于此次会议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基本确定了大专院校工农兵学员招收的条件。即，“具有三年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应在二十岁左右”，“一般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选拔工农兵学员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¹

招生制度上的“彻底革命”，大大降低了高校入学新生的文化素质要求。虽然在文化程度上要求“初中以上”，但实践中这一要求无法满足。有人戏称，工农兵学员是“大学的牌子，中学的教材，小学的水平，幼儿园的脾气。”²

¹ 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58页。

² 刘慧：“中国高等教育的怪胎——工农兵学员探析”，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4月，第59页。

参差不齐的文化程度和薄弱的文化底子显然不能达到大学课程的要求。面对学习上的压力，自认为肩负着“上、管、改”使命的工农兵学员们便喊出了一句豪迈的口号——“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

原以为这句口号是工农兵学员的首创，上网查了查，还真不是。此口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内高校。该口号“主要是指，在同学中有的人学习成绩不那么理想，特别是可能挂科的可能较大。于是班上其他同学都会想办法来帮助他，帮他把功课赶上来。这其中主要原因可能是基础不是太好，学习上有困难。”¹

不过“按当时高考录取的比例，真正基础差的应该不是太多，倒可能是某些调干生，他们可能没有经历过高中阶段的系统学习，所以到大学后，就存在着赶不上的问题。”²可见，这个在五六十年代中提出的口号，主要针对的是那些调干生³。调干生是保送入学，文化基础并不重要，所以学习上的困难可想而知。

没想到的是，在七十年代工农兵学员入学后，这句口号又重新喊了出来。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文化基础薄弱，学习上存在困难。

工农兵学员入学时的普遍文化水平显然要低于五六十年代入学的大学生。我们英语系73级入学的168名同学中，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上过高中的也是寥寥无几。像我这样连初中都没有上完的同学占大多数。还有的同学文革开始时还是小学生，初中都没有好好念完。

由于外语的特殊性，这种文化程度对学习英语专业的影响并不太明显。不像理工科，数理化知识并不构成学习英语的基础。但外语专业对学生也有其特殊的要求，最起码要口齿清楚，还要求有较强的听力、模仿能力和反应能力。这方面能力有欠缺的学生学起来可能就比较困难。

说到入学时的英语水平，同学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有的同学以前是上过外国语学校或外语学院附中的，有着比较好的英语基础；但也有的同学从未接触过英语，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这种差距经过一段的努力学习，一些同学是可以跟上的，但有的同学就不行了。

¹ 胡懋仁：“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载于《科学网》，2018年6月3日，<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78176&do=blog&id=1117098>，访问时间2021年11月25日

² 见前注胡懋仁文

³ 从1953年开始，凡是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的正式职工，经组织上调派学习或经本人申请组织批准离职报考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都称调干生。调干生上学的保送条件主要是本人出身好、表现好、领导信任，至于他原来的文化基础是不重要的。见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调干生/9789844?fr=aladdin> 访问时间2021年11月26日。

T同学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来自于新疆部队，家是河南农村的。入学时他的普通话讲不好，一口的河南话，以前也没有多少英语基础。他在英语学习上的困难很快就显现出来。

在语音语调上，英语的发音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他那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说出来的英语怎么听怎么像河南话。比如，他会把“shop”（商店），说成“小铺”；说“My name is xxx”的时候，前半句是英文，后半句自己的名字说的是地道的河南话。

上课时，很多时间老师要求每个同学要站在大家面前练习，为的是逐渐养成大胆开口说英语的习惯。每当轮到他说的时候，总会出点状况。不是音发不准，就是语调出问题。记得有一次，老师告诉他，说这句话应该用“升调”。他不知道怎么用“升调”，而是伸长了脖子使劲扬下巴。滑稽的动作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笑归笑，该帮助的时候大家还是尽力帮助他。不是说“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吗？很多同学都在课下主动帮他纠正发音，反复跟他一起练习对话。班上学习基础好的一位同学还跟他组成了“speaking pair”，课上课下专门辅导他。¹

这样，费了好大的力气，第一学期T同学勉强还能跟上。但随着学习的深入，T的困难就越来越大。从第二学期开始，由于“听说领先”阶段已基本过去，“读写”阶段逐渐成为学习的重点。为锻炼学生的“读写”能力，课堂上几乎天天作的一项练习就是“dictation”（听写）。

记得每天老师走进教室说过“Good Morning”之后，接着就是：“Let’s have a dictation”（让我们来听写）。我们就迅速打开练习本，准备好钢笔，等着老师开始。听写的内容通常是一段话，老师会念三遍。第一遍，只听不写；第二遍，老师念一句，我们写一句，包括标点；第三遍，老师完整地念一遍，我们从头至尾检查。然后合上练习本交给老师。老师批改后发还给大家。通常老师会把写错的地方用红笔做出更改，没有错误的，老师会根据出错的情况写上：“Not Bad”、“Good”、“Very Good”，还有“Excellent”。

这种练习几乎是每天的规定动作，后来体会到：这在初学阶段十分必要。因为英语作为一种技能，是要重复练习的。俗话说：“熟能生巧”。一种事情重复

¹ 关于学习上互相帮助的回忆，在二外英语系72级校友张焯的文章中也有描述。她写道：“因为我们都是‘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学习外语的天赋也不一样，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我们结成了‘一帮一’对子，互帮互学。”见张焯：“风雨40载——会议母校二外院”，载于《二外四十年》编辑委员会：《二外四十年》，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0月，第497页。

多了，便逐渐熟练，并产生了感觉和深刻的把握，这也是通常所说的重复原则。但当时我们并不特别了解这点，只是想多学点，学好点。

这种练习对于大多数同学没有太多的困难，顶多是错误多少的问题，我几乎每次听写都能得到“Good”、“Very Good”，还有“Excellent”。但对于T同学来说可就不一样了，听写对于他是件极其困难的事，经常一次听写下来记不了几个单词。

虽然当时没有考试，也不计成绩，但同学之间学习上的差距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种无形的压力使得T几乎喘不过气来。

终于有一天听写之后，在大家都忙着交练习本的时候，T红着眼睛冲出了教室，留下了一教室目瞪口呆的同学和老师。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一个追出去的同学回来说，T的听写又没写下来，回宿舍哭了。一个穿着军装当兵的男生在宿舍里抹眼泪，可以想象这压力有多大。

后来，大家还是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他。包括我在内，经常会利用课余时间陪他练习。T自己也非常努力，牺牲了许多休息时间练习，经常看到他在教室里戴着耳机听录音，边听边模仿。但所有这些都收效甚微。

无奈之下，在我们第一学年即将结束的时候，T申请了重读，也就是跟下一年级同学重新上一年级。由于是部队来的学员，经过了层层审批之后，他的申请才得到了批准。T成为比我们一年级——74级的学员。当我们都进入大二的时候，他仍然重回大一。

最终，T在我们毕业一年后毕业。

不管怎么样，T还是毕业了。但另一个故事中的主角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事情发生在我们上大三的时候。

一天半夜，睡梦中的女生们被一阵凄厉的叫喊声惊醒，紧接着是一阵重重的砸门声。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在喊“救命！救命！”“开门！开门！”。我睡在上铺，赶紧翻身下床，冲到门口。把门打开的瞬间就感到有个东西扔了过来，我本能地关上了门，只听到有东西“啪”的一声摔在了门口。接着，顺着下面的门缝隙有水流了进来。没等我回过味来，就是“啪啪”的砸门声，一个女生高喊着“出来，出来，你给我出来！”一声高过一声。听得出来，她是在拍我们隔壁宿舍的门。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宿舍的人吓得谁也不敢动，更不敢开门。

接下来的事情我并没有亲眼看到，是听同学讲的。

这次事情的主角是我们英语系74级的一位女生。我并不认识她，暂且把她称为X。

X是个东北姑娘，身材高大强壮，但平时学习很吃力，而且越学越吃力。教泛读的老师，无意之中说了她一句“你不是学外语的材料”。这句话深深刺激了她，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学习上的压力，加上老师的评价，二者的合力让X不堪重负，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行为怪异，猜忌，多疑。系里和同学们都有所觉察，并已带她去过医院。事发时，74级的同学都离开学校到外面开门办学去了，为了照顾她，系里专门安排了一位平时跟她关系最好的女生留下来陪伴她。在宿舍照顾她的生活，帮助她恢复。该女生是个南方姑娘，身材娇小。

事情发生的前几天，X已出现了明显的妄想和多疑，怀疑跟她在一起的那位女生要杀她，被怀疑的女生对此也有所警觉。那天她在晚上临睡前特地找到我们年级的同学，讲述了X的种种症状和表现，希望大家晚上睡觉时尽可能轻一点，听到呼救马上相助。

出事那天的半夜，精神病发作的X顺手从墙上拔了一颗大钉子朝陪伴她的那位女生脸上扎去。该同学睡梦中感到额头一阵剧痛，惊醒后忍着疼挣扎着从宿舍里跑了出来，挨着门砸同楼层宿舍的门。还好，砸到楼道尽头的一间宿舍时，门打开了，她躲了进去。

紧随其后的X，手里拿着那颗大钉子，还提了个装满开水的暖瓶在后面追。我们宿舍是楼道的倒数第二间，那个暖瓶就扔在了我们宿舍门口。据说那个暖瓶实际砸到了逃跑女生的后脚跟，她险些摔倒，非常危险。

眼看着那位同学跑进了最后一间宿舍，X手里挥舞着那颗钉子，一边拍门一边愤怒地高声叫骂。屋内是受了伤的同学，受伤的部位还流着血，吓得不敢出来。听到叫喊声出来的女生们，哪见过这种场面，谁也不敢靠近，胆子大点的只能站得远远地劝说。

那时没有手机，学生宿舍也没有电话，信息传递只能靠人传人。稍微平复了一下紧张情绪之后，有同学跑去了校医室找值班医生。七十年代的北京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急救体系。校医室的医生费了很大力气才安排了一辆救护车。

经过和医生紧急商议，决定先由几个身高力大的女生逐渐靠近X，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把她按倒在地，再由校医室的医生迅速上前将准备好的麻醉针给她打上。还好计划执行顺利。打了麻醉针的X逐渐昏睡过去，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抬到了已等候的救护车上。救护车直接开到了治疗精神疾病的安定医院。

这时，受了伤的那位同学才从躲藏的宿舍里出来，到校医室去处理伤口。伤口在额头和眉梢之间，流了不少血，缝了好几针（有同学说是12、3针）。第二天早上，我们宿舍门上的血手印还清晰可见。

等这一切处理停当，天已大亮。折腾了一夜惊魂未定的女生们才各自回宿舍昏昏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早上，男生们惊讶地发现大部分女生都没来上课。

我挣扎着爬起来去了教室。课间，全班的男生，还有老师，都听我讲述了夜里发生的事情。上午，从医院传来的消息，X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疗。

按说，事情到此已经结束。但中午吃饭时，大家惊讶地发现食堂外面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醒目的标题是——“还我阶级姐妹！”作者是我们年级的一位女生。大字报用“阶级斗争”解释了X患病的原因，矛头直接对着那位说X不是学外语材料的老师，火力全开。并且扣上了几顶大帽子：“资产阶级”、“迫害”“复辟”……等等。

这张大字报的出现在当时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主要舆论就是这样宣传的，“污蔑工农兵大学生水平低，质量差，……这些奇谈怪论的目的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大方向。”¹

从这张大字报里的内容可以看到，其内容并不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情绪的极大支配，“阶级斗争”和“阶级感情”就是这种情绪化的突出表现。作者视患病的同学为“阶级姐妹”，将自认为应该为此负责的老师视为“对立的阶级”。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资产阶级”导致了我们的“阶级姐妹”学习上的困难，最终患病。而所谓的“阶级感情”压倒了其它所有的感情；用“感情”判断，替代了所有理性的判断和思维。

但单凭“阶级感情”是解决不了学习上遇到的困难的。

工农兵大学生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我们入学时并没有按照学术的要求经

¹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采矿系大批判组：“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胜利前进——驳教育界污蔑工农兵学员的奇谈怪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6年第1期，第6页。

考试录取,入学后也没有进行系统的高等教育的学术训练。那句“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提倡学习中互相帮助是没有问题的,体现的是一个美好愿望。

但同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代,这句口号显然给专业学习涂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色彩。工农兵学员是带着无产阶级的嘱托来到大学“上、管、改”的,要夺回资产阶级占领的大学这块阵地。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我们是不能输的。资产阶级越是认为我们不行,我们越是要证明给他们看看,绝对不能让资产阶级看我们的笑话。

然而,一句口号代替不了学习上的刻苦努力和科学的训练,最终这句口号还是淹没在残酷的现实中。

后来,X同学的身体状况已经很难再坚持学习了。直到我们毕业离校,也没再听到她重返校园的消息。万幸的是,那位被她扎伤的同学,受伤后脸上留下的瘢痕可以用刘海挡住,对容貌没有太大的影响。☞

【读者来信】

1. 何蜀来信:

拿到307期《记忆》,当然首先拜读刘海鸥的画说一生,不但文字好,画也好,真实生动,是难得的图文并茂的回忆。本期这部分中有一小错,即在成都听到八二六派广播中唱的那首“派歌”,头一句“南飞的大雁”写错了,应是“远飞的大雁”,那是在盼望大雁飞到北京去,从成都往南怎能飞到北京?那歌是把一首据说是藏族民歌改了歌词唱的,原歌词中“翻身的人儿”改唱成了“八二六战士”,其他地方也有另外的组织将自己一派名称改上去唱的。

另外在目录中看到此篇下面一篇的标题是《试谈贾宝林的中举》,先还在想:这贾宝林是何许人?待看到正文时才知是目录将贾宝玉错写成贾宝林了。☞

2. 塔拉来信:

读完言真《为了明天的纪念》。首先引起我思考的就是,我们将为了什么样的明天,来纪念这段悲惨的历史?

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这一个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大时代,在这100多年里,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怀抱着对明天的理想,投身革命,有的是国民革命,有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不得不遗憾地看到,这些怀抱着理想,投身革命的年

轻人，绝大多数最终都抱着困惑和精神创伤，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和权斗中，离开这个他们所试图拯救的世界。

曾经有一个大人物气壮山河地说过这样的话：共产党打天下牺牲了3,000万人，今天谁要夺这个政权，也得拿3,000万人头来换！

一个政权的更迭需要3,000万人头，这是一个多么血腥的历程？

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一次又一次继续战斗的革命者，要他们接受他们的革命是根本错误的，他们战友的血流得毫无价值，甚至可能是对人类文明社会的摧残，他们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言真的这篇文章纪念的是什么呢？自然是那个最残酷的时代个人和家庭所遭受的苦难，但正如作者本文的题目所示，纪念这一段历史，解构这一段历史悲剧的根源，为的是明天，我们的下一代所要经历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应该没有暴力革命，没有阶级斗争，善恶是非，明白如水，权利义务，自由意志，都有法律的保障。为了这个明天，我们希望有更多言真这样的记述，以使我们不忘记这个黑暗的昨天。📌

【资料】

一封充满革命感情的信

×××同学：

看到你现在的情况，真是和我过去差不多。过去，我也是一个调皮的学生，上课不听讲，下课不交作业，随便和老师顶嘴，无故和同学打架、吵嘴。当时，我认为自己多了不起，多勇敢呀！可是我现在深深地认识到自己以前错了！

咱们的父母都是老革命干部，从我自己父母的身上，从他们的老战友身上，我看到了革命先烈对咱们的希望。

我爸爸妈妈经常给我讲一些艰苦的战斗年代的小故事：有一次，父亲在前线，我病得很重，眼看没有救了。可是伤病医院院长听到这个消息后，坚决地说：“这是革命的后代，以后要靠他们打天下，一定要救活他！”当时我离医院38里路，而且都是山路。用担架抬怕不安全，于是一个叔叔爬上树去，用砍下的树枝编了一个大筐，把我放在筐内，两手小心地托着，一直把我送到医院。刚放下我，那

个叔叔就累昏了。在医院里，我要开刀，可是强心剂不够，战士就说：“把强心剂留给他吧！”而自己忍痛动了手术。又有一次，敌人追得太厉害，只好把我寄放在一个老乡家里。你也想得到，那该是多么危险啊！可是老乡说：“这是八路军的命根子，只要我们家在，就一定保住他！”就这样，在老乡的掩护下，我和敌人照了三次面，保全了生命，然而老乡却冒了很大的危险……。

在我最闹的时候，我妈妈的一个老战友逝世了，报纸上登出了她逝世的消息的那天晚上，妈妈把我叫到她的房里，讲了那个阿姨临死前妈妈去看她的情景。

她患的是癌症，临死前十分痛苦，全靠打止疼针和葡萄糖来活着。看到我妈妈进去，她挣扎起身子，和妈妈谈话。几句话后，她就问起了我，问我入团了没有，学习好不好。妈妈怕伤了她的心，忍住了泪水，没有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妈妈临走时她说：“我是不行了，让孩子们来接我的班吧！”

妈妈对我说：“她几十年来，一直忠心耿耿为革命工作，关心你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就在她病的那样还想到你，可你呢？”“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是党给的，都是革命同志给的，你不好好干，对得起谁？”

那一夜，我好久没有睡着。开公祭大会的那天早上，我到嘉兴寺殡仪馆去和她的灵柩告别，当看到她照片上那微笑和善的面孔，我流下了眼泪。我第一次感到，做一个革命接班人不是一句空话，我们革命前辈，有的在战场上牺牲了，有的在那艰苦的年月里丧失了健康，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事业靠谁呢？不是靠我们吗？再过几年之后，不就是要由我们补上他们的空位吗？可是接班人就像我这样，能接下这副革命的重担吗？！我们的先辈干革命，历尽千辛万苦，经过出生入死的战斗，革命终于胜利了。他们唯一不放心的是：“孩子们，江山打下来了，可你们能保卫建设它吗？”咱们如何回答呢？

我的叔叔，为抗美援朝不幸逝世了。在他逝世后，婶婶含着眼泪送给我一个活页夹和一支圆珠笔，她说：“这是叔叔临死前一定嘱咐要交给你的。”打开活页夹，上面写着：“好好学习，听爸爸妈妈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当时我哭了。记得上高中以后，每当我看到这个本子，想起叔叔的谆谆教导，就忍不住流下激动的泪水。可是我在长大的时候偏偏把叔叔的话忘了！我忘的不是我的叔叔，而是忘了所有的先烈啊！×××同学，你在这方面大概也有所体会吧？千万不能忘记：今天的一切都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

革命干部的子弟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大概想过吧？如果说我们革命干部子弟和别人有区别，那就在于我们是在党的怀抱里长大的，亲爱的党一手抚养了我们，更多的教育了我们，那我们就应该在政治上比别人成熟的更早，思想觉悟比别人提高得更快，担子比别人挑得更重！

我们革命干部子弟应该“大方”，但绝不是花钱上大手大脚，是要胸怀大志，心胸开朗。要看得更远，心里有世界无产阶级事业，有整个全球。

我们应该“直爽”，但是绝不意味着不尊重老师和同学，而是待己严，待人宽，敢于批评别人的错误，同时也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批评，对组织要有啥说啥。

我们应该“坚强”，但绝不是不接受任何批评，应该是对困难、对敌人的宁死不屈，立场绝不动摇。

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我爸爸是负责干部，我闹一点儿没什么关系。这是最错误，也是最可耻的思想。爸爸的职位，只是说明他所负责的革命责任更重，而绝没有等级的差别。我过去认为大家会更尊敬我，羡慕我，其实错了。从小说中，从电影中，你也知道，旧社会的少爷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不注意思想改造，就可能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咱们自己要是真不好好干，不但自己危险，而且给党，给我们的父母丢了脸——革命的爸爸妈妈却教育出一个不革命的儿子！

中国今后的方向怎样？这还要看我们和我们后几代青年的思想动态。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都在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我们怎样永远跟着党走呢？这是多么重要的问题呀！我们的责任，不但要改造我们自己，而且也要敢于同坏思想做斗争。我们一定要继承父辈的革命事业，绝不能让革命的大旗从我们手中跑掉，你有这个决心吗？

真诚地希望你也能成为一个共青团员，做党的一个好儿子，爸爸妈妈的好儿子。我常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去参观，激励我不断前进，南京不是有雨花台吗？那里牺牲了几十万革命烈士，希望你以后去的时候，代我向烈士们致以最沉痛的悼念。☞

祝你进步！

你的同学

（此信作者宋心鲁系北京四中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其父宋养初，曾任国家建材工业部部长，其母杨滨，曾任北京四中校长、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司长。）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